

## 李浴日先生與《中國兵學大系》

李龍

李浴日先生窮其一生研究軍事學。他從倡建現代中國軍事理論體系出發，廣羅歷代兵書，決心編輯一部規模宏大的《中國兵學大系》或《中國武庫》。經過數十年不懈的努力，終於在 1955 年春完成，可惜還未來得及出版他便闔然長逝了。此後，其遺著的出版，是一件令人十分掛懷的事情。他的遺孀賴瑤芝女士決心完成李浴日先生這一未竟的事業，她為此而四處奔走、呼籲，得到了臺灣當局的鼎力支持。1957 年春，《中國兵學大系》得以順利出版。據核查，該書收入歷代有代表性的兵書 33 種，作者 29 人，裝訂為 14 巨冊，共 6000 餘頁，規模相當壯觀。該書問世之後，賴瑤芝女士遵照編者生前“寫一篇《大系》的長序，就所收兵書，一一介紹其要領，縱觀全文就是一部《中國兵學思想史》”這一遺願，曾經呼籲人們寫作此序：“謹以萬分誠意，祈求先夫友好以及讀者，請於賜讀本《大系》之後，參古證今，引用所收各書原文，撰寫《中國兵學思想史》一篇。”<sup>(1)</sup>並許以筆酬，定下書數（2——3 萬字），可見這篇長序是如此的重要。今天，李浴日先生去世已半個多世紀了，賴瑤芝女士也已作古，人們重讀他們所編兵書，就有撫今追昔之慨。因此很有必要對這部兵學經典做概括和闡述，以實現他們的遺願。

### 一、李浴日先生搜集中國歷代兵書的過程。

編纂大型軍事叢書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很大的人力、財力才能夠完成。如大陸編輯的《中國兵書集成》，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後勤學院、北京圖書館等 10 多個單位的近 100 名專家、學者通力合作，費時多年才共同完成的。而《中國兵學大系》卻是李浴日先生一個人在戎馬倥傯的年代裏用他一生的心血，在不斷搜集、多次遴選有關兵書的基礎上獨立完成的。為編輯此書，數十年來，他不畏辛勞，足跡跑遍全國各地。如到浙江圖書館、重慶軍人俱樂部、杭州舊書攤、臺灣圖書館等處，通過買、借、抄等途徑和辦法，廣泛搜集歷代兵書。“他雄心未了，窮思極慮地去設計，去籌劃，欲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力達成此書的出版”<sup>(2)</sup>。據賴瑤芝女士回憶，他倆結婚後她即接受了有關兵書的管理。他倆於 1940 年結婚，說明結婚之前他已經搜求兵書了。李浴日先生於 1933 年赴日留學，並開始了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先夫少年時即愛好兵學。留學東瀛時，目睹日人崇尚我國兵學……他便細心搜集和研究，決心發揚我國兵學”<sup>(3)</sup>，“《千慮策》是一部定國安邦的奇書，作者宋代吏部郎中楊誠齋先生……這一部書，為木刻本，字體清秀。我於 1936 年得自扶桑，攜之返國，東遷西徙，幸未遺失。”<sup>(4)</sup>這足以說明李浴日先生在日本求學時已開始系統接觸和研究兵書了，也是從此時開始，引發他系統收集兵書。他一生收集了多少兵書，又是從哪本開始，我們現在無法統計。但從他的軍事學研究整個過程看，他是從研究《孫子兵法》開始，應該說也是從收集《孫子兵法》開始的。他不但收集

國古代兵書，而且收集世界兵書，如日譯本《戰爭論》。“及至勝利還都，他更奮力廣事古兵學的收集和鑽研。”說明這一時期是他收集兵書的豐盛時期，明版《孫子兵法》正是這個時期他到杭州舊書攤裏購得的。從中也說明李浴日先生實為民國時期中國兵書（包括《孫子兵法》）收藏和研究大家。不僅收藏數量大，而且還收藏了不少珍本、秘本。在戰亂連綿、播遷不定的日子裏，保存這些兵書更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他跟著戰事的轉進，由京（即南京，筆者注）、滬而粵、湘，而桂、黔”，“兵書文墨，尤其這些古本兵書，永遠是我們的重要行囊”（5）。戰爭的殘酷，使他有時不得不忍痛割愛，把所購得的部分兵書留置全國各地：“他一方面搜集，一方面探究，一方面還得割愛留置各地”。筆者曾經從江西某舊書店郵購到他所著的《中山戰爭論》署印本，說明他有一部分遺物及兵書還散落在大陸各地。從中可知，為編輯《中國兵學大系》，李浴日先生與賴瑤芝女士所遇到的困難是無法想像的，從中也說明《中國兵學大系》的誕生是多麼的不易啊！

## 二、《中國兵學大系》所收兵書的卷數和版本。

《中國兵學大系》所收兵書絕大多數為線裝本，版本自宋至清、民國均有。第1冊：《武經七書》，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宋版影印本。在《我得了一部明版孫子兵法》一文中，李浴日先生談到這個版本的來歷：“我曾購得商務印書館影印東京岩崎氏靜嘉堂藏本的《武經七書》（內有孫子），現該書無注釋。”（6）日本靜嘉堂藏本，為南宋時期刻本，25卷，3冊。原藏於湖州陸心源的“皕宋樓”，後流入日本，該版本校勘精審。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曾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靜嘉堂藏本，列為商務印書館《續古逸叢書》之38種。據此印證，兩者一致，故此版本是以靜嘉堂原本影印無疑。第2冊：《孫子音注》，全書共6卷，為明代陳汝忠弘錫堂初刻本：“本文所指明版《孫子兵法》，系明代解元鐘吳、何守法校音、解注，出版於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全書共分六冊，字體清秀，完整無缺。”（7）今比較對照，兩者也是一致的，珍貴。第3冊：《汪氏兵學三書》，共5卷，清末汪宗沂輯，“漸西村舍”（8）叢書之一，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刻本，《〈衛公兵法〉輯本序》內有“光緒十四年冬十一月歙汪宗沂自敘，二十年校定”字樣，“漸西村舍”為清末袁昶的刻書名稱；袁昶原名袁振蟾，字爽秋，號漸西村人，浙江桐廬人，他的“漸西村舍”叢書被後代學者認為是晚清叢書中之“尤為重要者”，刻本較精。第4冊：《陰符經注》，不分卷，漢張良注；《風後握奇經解》，不分卷，漢公孫宏解（9）；《黃石公素書注》，不分卷，漢黃石公撰，宋張商英注；《心書》，不分卷，三國時期諸葛亮撰；《何博士備論》，1卷，宋何去非撰。以上各書均為清後期版本，刻者不詳。第5冊：《太白陰經》，唐李筌著，10卷，道光二十四年（1844）版本，為金山錢熙祚《守山閣叢書》子部，據錢熙祚《太白陰經跋》稱，此書“前六卷主舊抄本，七、八卷主文淵閣本，仍參合異同於下，唯九、十兩卷，則仍依張刻付梓云。庚子長夏金山錢熙祚識”，可知它是經過增補刪汰方成；該刻本校勘精審，遠出諸家，被中國國家圖書館作為善本圖書收藏。第6冊：《虎鈴經》，20卷，宋許洞撰，清代版本，刻者不詳。第7冊：《投筆膚談》，2卷，明代何守法撰音、點

注，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陳汝忠弘錫堂初刻本，字體清秀，難得。《中國兵書通覽》十分重視此影印本，把它當做現存重要版本進行介紹。《陣紀》，共4卷，明何良臣撰，清代嘉慶十五年（1810）版本。該版本源於張海鵬《墨海金壺》史部。《百戰經》，2卷，明代王鳴鶴編訂、何仲叔輯，明代寫刻本，版藏南陽石室，珍貴。《兵經》，3卷，明末清初揭暄著，民國22年（1933）南京陳無悶校補版本。第8冊：《兵跡》，明末清初魏禧著，12卷，附校勘記1卷，劉家立撰，收入胡思敬所輯的《豫章叢書》中，民國乙卯年（1915）南昌初刻本，書後的《〈兵跡〉校勘記》有“右《兵跡》，據甯都何氏以仁舊抄本附刊，乙卯臘月宛平劉家立記”字樣；《豫章叢書》是江西地方文獻資料中卷帙最多、內容最豐的大型叢書，影響較大，此版本現藏中國軍事學院軍事圖書館。第9冊：《兵謀》1卷，《兵法》1卷，清魏禧著，道光十年（1826）世楷堂《昭代叢書》丁集新編補之其中二種，初版本；《昭代叢書》為近代重要叢書，清代道光間吳江人沈懋德輯。《乾坤大略》，10卷、《補遺》1卷，清王餘佑著，《畿輔叢書》之一，光緒五年（1879）初刻本。《畿輔叢書》為定州王灝謙德堂所刊，《乾坤大略》及《補遺》是依據咸豐四年（1854）秦聚奎校錄的本子，刻工精細。第10冊：《草廬經略》，12卷，明無名氏撰，道光三十年（1850）粵雅堂版本。該書後跋有“道光庚戌立秋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字樣。第11冊：《洪濟百金方》，14卷，清惠麓酒民編，民國22年（1933）版本，蔣介石作序。第12冊：《百將圖傳》，2卷，清丁日昌撰，同治九年（1870）版本（第2版，初版為同治八年）；《古今女將傳贊》，2卷，清朱孔彰編，民國27年（1938）刻。第13冊：《孔孟治兵語錄》，現代趙尺子選注；《岳飛治兵語錄》，現代劉詠堯編輯；《戚繼光治兵語錄》，明戚繼光撰，劉詠堯編輯。以上三書，均為上世紀50年代版本；《曾胡治兵語錄》，近代蔡鏗編輯，宣統三年（1911）初刻，1924年蔣介石將此書作為黃埔軍校教材，並增輯《治心》一章，以增補形式出版，收入本書有《治心》一章，為1924年增補版本。第14冊：《國父治兵語錄》，劉詠堯編輯，上世紀50年代版本；《蔣總統治兵語錄》，鄧文儀編。《蔣總統治兵語錄》原名《蔣主席治兵語錄》，1947年由南京新中國出版社出版。收入此書時，鄧文儀做了增補，為上世紀50年代版本。

從以上有關記載和考證可以看出，《中國兵學大系》版本多樣：有宋版本、明版本、清版本、民國版本；有初刻本、精刻本、叢書本、影印本；有木刻本、鉛印本等等，內容相當豐富。它反映了中國古代兵書的不斷傳承和流轉，極具版本保存和研究價值。至今仍是研究中國歷代兵書版本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 三、《中國兵學大系》的特點。

（一）《中國兵學大系》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古、近代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之集大成之作。

中國古代兵書“萌芽于殷商，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戰國，直到清末，歷代著述不綴”<sup>(10)</sup>，它具有歷史悠久、數量大、種類多、內容豐富、體裁多樣、連續性

和哲理性強、反對迷信而又利用迷信、通俗易懂、深受經學影響大、注疏之作很多等 10 大特點（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上篇）。《中國兵學大系》具有古代兵書的一般特點，尤以下列 3 方面的特點顯著突出：

1、從內容看，搜羅十分廣泛，所輯資料豐富而全面。從總體來說，它的內容包括了古代兵書所有的分類，即包括了“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sup>(1)</sup>。如果按現代軍事圖書的分類，它的內容則包括：在武學經典著作方面，《武經七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是中國古代軍事理論中的瑰寶；列為該書之首的《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兵書，也是世界公認的現存最古老的兵書。《何博士備論》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人物評論集。《心書》從各方面論述了為將之道，是反映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是諸葛亮本人的戰略、戰術思想以及治軍帶兵方略的集中體現，對於今天的現實生活仍然具有積極的借鑒作用。《草廬經略》是明代後期在軍事理論方面較有成就的一部兵書，它對歷代用兵經驗進行了條分縷析，歸納概括，結合戰例加以闡述，並對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許多思想至今很有價值。在戰術、戰法方面，《握奇經》是中國古代論述八陣的兵書；何良臣的《陣紀》是明代關於選練與作戰的兵書。在軍事史方面，唐代重要兵書《太白陰經》，輯錄並保存了古代許多軍事資料，如唐代有關山川、道里，關塞、四夷等資料，對科學技術、交通史、軍事地理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在人物傳記方面，丁日昌的《百將圖傳》，是一部名將傳記作品。記述了從春秋到清末 100 個傑出軍事將帥的故事，著重敘寫他們戰鬥生涯中一兩個戰例和故事，來突出將帥們的超人智勇和光彩品德；朱孔彰的《古今女將傳贊》，是關於中國古近代女將的傳記，等等。這些兵書，是中國古、近代軍事實踐和軍事思想的記錄，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難怪黃傑將軍在本大系序言裏評價說：“自孫吳以至近代，兩千年來論兵之精者，悉粹其中。網羅之密，搜討之勤，先獲我心，亦可謂獨抗千古。”<sup>(2)</sup>

2、從選擇的質量看，做到精挑細選，去偽存真，科學遴選。幾千年來，中國古近代軍事家、軍事學家們著作的兵書卷帙浩繁。據統計，中國歷史上著錄兵書 3380 部，23503 卷（959 部不知卷數者未含內），其中存世兵書 2308 部，18567 卷（731 部不知卷數者未含內）；存目兵書 1072 部，4936 卷（228 部不知卷數者未含內）。真可謂浩如淵海，蔚為大觀<sup>(3)</sup>。雖然這些兵書大都已經失傳，但所幸的其中 200 餘部能夠保留下來。它們有的是出生入死、刀光劍影的血和火的戰場經驗的總結，精彩紛呈，有的卻也陷於刀槍不入的蒙昧、迷信。所以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兵書良莠不齊。為保證質量，李浴日先生並不是有見必采，而是善於取捨。它“網羅既富，擇取亦嚴”，所選錄的 33 部兵書大都是可靠的軍事資料，經典之作，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頗具代表性。如《孫子兵法》、《武經七書》、《投筆膚談》、《泝澗百金方》等，均為兵書精粹。“他對本《大系》確曾窮精竭力，無時無地地注意去搜選。中間雖千磨百折，但他矢志不移，他不知肉味，不爭榮利。始終堅毅苦幹。”<sup>(4)</sup>而對一些不科學的東西則棄之不輯。與此同時，他還善於聽取其他專家、學者的意見，向整個社會公開《中國兵學大系》書目，徵

求意見：“近年曾經前後二次油印《大系》目錄，面函商請參加意見，以便排印。”<sup>(15)</sup>表現出相當嚴謹和極端負責任的治學態度。

3、全書分類科學，結構合理，種類、體裁多樣，體系完整。許保林在《中國兵書通覽》中把古代兵書做了如下分類：“按內容分，有兵法、兵略、訓練、陣法、陣圖、兵制、兵器、城守、鄉兵團練、軍事地理、名將傳略、軍事後勤、軍事天文和氣象等；按體裁分，有論文體、語錄體、記敘體、注疏體、輯評體、筆記體等；按書籍形式特徵分，有綜合性兵書、彙編兵書、軍事叢書、軍事類書等；按書籍制度分，有冊本（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竹簡本《孫臏兵法》）、版牘本（如青海上孫家塞漢墓出土的木簡本《孫子》佚文）、帛書本（如湖南馬王堆墓出土的帛書軍事地圖）、紙寫本、紙印本、卷子本（如在敦煌發現的唐卷子本《六韜》）線裝本、木刻本、活字本、印本等等。”依據這一分類，《中國兵學大系》屬大型綜合性叢書類軍事圖書。就其收入兵書的內容、體裁等方面的不同，它是以冊分類，從第1冊——第14冊，各冊又具有不同的特點。第1冊：為叢書類，主要收入中國古代第一部綜合性軍事叢書《武經七書》，共有7部兵學經典。第2冊：屬注疏類，收入何守法彙集11家關於《孫子兵法》的注釋、辨音。第3冊：屬輯佚類叢書，收入汪宗沂輯錄的中國古代3部“兵家佚文”，包括《太公兵法逸文》、《武侯八陣兵法輯略》、《李衛公兵法輯本》。第4冊：為兵法、陣法類兵書及其注疏，包括《陰符經注》、《風後握奇經解》、《黃石公素書》、《心書》、《何博士備論》。第5冊：為綜合類兵書《太白陰經》，收錄歷代兵家的權謀智慧。第6冊：為綜合類兵書《虎鈴經》，是綜合各家論兵的代表著作，它的前10卷論述了用兵問題，對《孫子》和《太白陰經》的思想作了發揮；後10卷主要講述八卦占星雲等。第7冊：為兵法類兵書《投筆膚談》、《陣紀》、《百戰經》、《兵經》。第8冊：為綜合類兵書《兵跡》。第9冊：專門輯錄兵略類兵書，包括《兵謀》、《兵法》、《乾坤大略》。《乾坤大略·跋》非常明確地指出：“此非談兵也，談略也。兵則千百端而不盡，略則三數端而已明矣。”第10冊：為兵法類兵書《草廬經略》。第11冊：為城守類兵書《洪濬百金方》，收錄戰法、陣法、防衛等具體戰術。第12冊：為軍事人物傳記類兵書，包括丁日昌的《百將圖傳》、朱孔彰的《古今女將傳贊》，它們是中華兒女千古名將的傳記，記述了從春秋到清代傑出男女將帥的故事。第13冊、第14冊，為“兵學語錄”，為後人輯錄各家治軍用兵言論的代表著作。包括孔子、孟子、岳飛、戚繼光、曾國藩、胡林翼、孫中山、蔣介石等人治軍用兵言論等。從總體來看，《中國兵學大系》所收兵書中，兵法類佔有較大的比重。收入本書的體裁也比較全面，有論文體、語錄體、記敘體、注疏體、輯評體、筆記體等，各書所配圖表近300張。其中《百將圖傳》有圖100張（一圖一事），《百戰經》有圖20張，《洪濬百金方》有圖175幅。這些圖包含各種人物、兵器、攻防器械、火炮戰船等，內容非常豐富。

總之，《中國兵學大系》吸收了《武經總要》、《武備志》等大型軍事叢書的編纂特點，又加以創新，所收軍事資料更加豐富而全面，體例也更加完備、科學。時間跨度更長，達2000多年。既收入古代的、近代的，也輯錄民國的。並增加了

宋代名將岳飛、明代名將戚繼光等人的治軍思想和清末名將曾國藩、胡林翼、丁日昌及民國軍事家孫中山、蔣介石等人的軍事論述。在深度和廣度方面，前所未有，幾乎囊括民國以前的軍事研究成果，基本上能反映出中國軍事理論發展、變化的歷史過程。它與宋代《武經七書》、明代茅元儀的《武備志》一脈相承，具有里程碑意義。

四、《中國兵學大系》反映了李浴日先生謀求倡建現代中國軍事理論體系的軍事思想。

雖然在《中國兵學大系》中我們找不到李浴日先生對中國歷代軍事學發展所作的闡述，甚至連一篇序言都未見（原因是寫後散失或未寫），但從他編纂的目的來看，恰恰反映了他是借自前人之口來表達倡建現代中國軍事理論體系（即民國時期的軍事理論體系）的強烈願望。如何構建現代中國軍事理論體系？李浴日先生在其它著作裏對此展開了相當全面的論述。他說：“有戰爭就要提倡兵學，發展兵學。兵學是武力的基礎，戰爭的長城”。又說：“所謂中國本位兵學，其本質是革命的，反侵略的，內容則依於國情和對象而定。惟欲建立之，首先要瞭解中國固有兵法，時代環境的需要及世界各國的兵學。我們不能固步自封，離開時代，也不能盲目抄襲，全盤移植。”<sup>(16)</sup>在《兵學隨筆》裏，他強調建立現代軍事理論的重要性：“在歷史上，我們不見有無軍之國，亦未見有不學之軍。不消說，無軍之國，亡可立待，不學之軍，戰必敗衄。建兵學在今後建軍上將更趨重要，這是歷史發展的鐵則。因為今後建軍工作的複雜性與專門化，須有兵學以為準繩，戰爭的科學化與機械化，尤須有兵學以為遵循。”<sup>(17)</sup>在“關於兵學的建設”一節中，他指出了當時我國軍事學界所存在的3大問題，並就如何建立中國現代軍事理論的新體系提出了自己的構想：“在過去對日抗戰期間，我國兵學界，依然混沌雜亂，漫無主流，見仁見智，各是其是，當時有人給它劃分為這三派：一是保守派——知古而不知今；一是現狀派——只顧現狀，不求進步；一是理想派——徒有理想，忽略現狀。事實上，這都不夠稱為“派”。至於我的意見，認為欲建立中國現代兵學的新體系，除針對現狀，攝取列國兵學的精華，還要發揚我國固有兵學的偉大哲理（傳統），他如民族性及戰爭的遠景，亦不可忽略。尤其是在思想上，必須排除以侵略為本的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兵學思想。因為這兩極思想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造成的罪惡，己是有目共睹。”<sup>(18)</sup>從中可見，李浴日先生編纂《中國兵學大系》的目的，就是謀求建立現代中國式的軍事理論體系。構建現代中國軍事理論的基石是中國傳統的、固有的兵法，而編輯《中國兵學大系》就是弘揚中國傳統的、固有兵法的重要一環。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李浴日先生倡建現代中國軍事理論體系、發展現代中國軍事理論的目的是為了抵禦外侮，實現世界和平。早在1932年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期間，他曾寫了《滬戰中的日獄》，揭露日軍的侵略行徑，對推動抗日救亡起了積極的作用。1937年10月，他又出版了不朽名著《抗戰必勝計劃》。他的現代軍事理論誕生於中日矛盾尖銳的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他的研究成果最為輝煌。所以，毫無疑問，他的兵學理論是為抵禦外侮、促進世界和平為目的的。他指出：

歐美的兵學思想，自克勞塞維慈以來已走入歧途了。即他們全以“徹底殲滅”的殺人主義為本。所以到了工業發達以後，便竟相致力於武器的發明。尤其到原子彈發明之後，殺人的技術與威力益加巧妙而猛烈，一舉便可殺人數十萬。象這種“殺人”的兵學思想，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恐怕全世界都要毀滅。所以我們要糾正這種錯誤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學思想發展起來不可。“我國向來的兵學思想，都可以說是以救人為本的。象孔孟所倡導的‘仁師’、‘義戰’，孫子所倡導的‘全國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吳子倡導的‘綏之以道’、‘五戰者禍’，又司馬法的所倡導的‘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這種崇高的學說實值得我們今天來倡導”；“我們主張原子彈應運用於‘止戰’、‘救人’。我們應大聲疾呼共起而建立‘以仁義為經，以和平為緯’的救人的兵學思想。”<sup>(19)</sup>他又指出：“所謂‘世界兵學’，即大同主義的兵學，其根本思想是反侵略主義，反帝國主義，而以全世界、全人類的永久和平、自由、康樂為基調來指導新的世界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務使侵略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思想永絕於新戰爭的勝利以後，而兵學亦於此時由明朗而廢除，由完成其使命，而變為歷史的陳跡。”<sup>(20)</sup>這就是說，李浴日先生倡建現代中國軍事理論體系、發展現代中國軍事理論，就是要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通過戰爭去消滅戰爭，實現世界的永久和平。它充分表明了李浴日先生的軍事理論具有進步的、辯證法思想。

綜上所述，《中國兵學大系》在中國軍事圖書編纂史上豎立起了一座巨大的豐碑。正如賴瑤芝女士在《〈中國兵學大系〉跋》中引用李浴日先生的話說：“這是我國歷代兵家名作，是歷史的靈與血的晶瑩的結晶，是歷盡滄桑、千錘百煉、不朽的軍人魂，是萬古常新的用兵原理、原則。”它既涵蓋了軍事各門類的內容，又涉及到哲學、政治、經濟、外交、科技、交通、航海、天文、氣象等各學科的知識，對研究中國古、近代軍事史（包括軍事思想史），經濟史，交通史，海外關係史，科技史，歷史地理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參考價值。該書所涉及的決策、謀略及將才思想，指揮藝術與治軍方法等，對當代和今後的經濟決策和管理仍是珍貴的參考資料。

《中國兵學大系》開創了現代大型軍事叢書影印編輯的新局面。數十年來，中國兵書的整理、編輯以及1987年起至90年代由解放軍出版社與遼沈書社聯合出版的《中國兵書集成》，正是在此基礎之上完成的。

尤其在當前，它對我們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搞好統一戰線建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反對台獨，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 § 注釋：

- (1) (2) (3) (5) (14) (15) (19) 賴瑤芝《〈中國兵學大系〉跋》，載李浴日《中國兵學大系》精裝本第6大本，臺北世界兵學社1957年1月初版。
- (4) 李浴日《兵學隨筆·將不厭新》第4輯。
- (6) (7) 李浴日《我得了一部明版孫子兵法》，1978年5月1日臺灣東府出版社出版《孫子兵法總檢討》初版第27頁。
- (8) 《中國兵學大系》第3冊《汪氏兵學三書》左下角記刻者名稱為“漸西村舍”。
- (9) 《中國兵學大系》第4冊《風後握奇經解》署名（漢）公孫宏解，198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縮印本317頁“宏”作“弘”，與刻本有異。
- (10) 許寶林《武庫精華——評〈中國兵書集成〉》，2000年11月遼寧教育出版社《遼版圖書評論集》。
- (11) 劉歆《兵書略·小序》：“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兵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陰陽者，順勢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 (12) 黃杰《〈中國兵學大系〉序》，載李浴日《中國兵學大系》（精裝本）第1冊，臺北世界兵學社1957年1月初版。
- (13) 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1990年10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第23——24頁。
- (16) 李浴日《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譯者序》，臺北世界兵學社1956年6月第4版。
- (17) (18) 李浴日《兵學隨筆·兵學的重要性》第1輯。
- (20) 1947年9月世界兵學月刊《世界兵學·創刊六周年獻詞》第5卷第1期第1頁。



§ 附錄：

## 《中國兵學大系》各冊概要

### 第 1 冊：《武經七書》

又稱《武學七書》，簡稱《七書》，共 25 卷。收錄從先秦到唐、宋間 7 部重要兵書，包括《孫子》、《吳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六韜》。參加本書校訂的為武學博士何去非、朱服。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屬福建）人。以“對策”長於論兵，入仕授武職，後著《何博士備論》28 篇，深為翰林學士蘇軾讚賞。朱服（1048-?）字行中，湖州烏程（今浙江吳興）人，熙寧六年（1073）進士，累官國子監司業、起居舍人、集賢殿修撰等。

《武經七書》是封建社會根據興武備、建武學、選武舉的需要逐漸形成的。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元豐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下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並雕版刊行，號稱“七書”，《武經七書》即源於此。自此，它被定為官書，頒之武學，並列學官。能否諳熟《武經七書》，成為封建社會選拔軍事人材的一條重要標準。

《武經七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它的頒定，確立了兵書在封建社會的正統地位，促進了古代軍事學術的發展。不但在中國兵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對世界近代、現代軍事科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今存最早的《武經七書》，為日本靜嘉堂所藏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刊本，還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武經七書》本等。《武經七書》校刊精審，後世多據為底本（參看 1989 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縮印本第 811 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孫子兵法》第 543—546 頁）。

1、《孫子兵法》。又稱《吳孫兵法》、《孫武兵法》、《孫子》，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最著名的兵書，也是世界公認的現存最古老的兵書，位居《武經七書》之首，孫武撰。孫武，字長卿，齊國人，春秋末期著名的軍事家。《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已有《孫子兵法》13 篇的記載。1972 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書殘簡亦有《孫子兵法》“十三扁（篇）”記載和《吳問》等佚文。銀雀山竹書《孫子兵法》為迄今最早的本子，惜為殘簡，不能窺其全貌。《孫子兵法》注家甚眾，以曹操、杜佑、李筌、杜牧、陳皞、賈林、孟氏、梅堯臣、王皙、何廷錫、張預等 11 家注最有名，現存的重要版本有南宋甯宗時所刻《十一家注孫子》3 卷足本，宋刊《武經七書》本最為詳備。另有西夏文本以及明、清以來各家注本 50 餘種。現有日、法、英、俄、德、捷等譯本，已翻譯成近 30 種文字，在世界上廣為流傳。

今存《孫子兵法》13篇，5900餘字。《始計第一》，主要論述研究和謀劃戰爭的重要性，通過戰略運籌和主觀指導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對戰爭勝負的預見，提出了“五事”、“七計”、“兵者，詭道也”等軍事原則；《作戰第二》，主要討論物力、財力、人力與戰爭的關係，提出了“兵貴勝，不貴久”的速勝思想和“因糧於敵”的原則；《謀攻第三》，主要論述“上兵伐謀”的“全勝”思想；《軍形第四》，主要論述戰爭必須具備客觀物質力量即軍事實力，中心講“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兵勢第五》，主要論述在軍事實力的基礎上如何正確實行作戰指揮問題，通過靈活地變換戰術和正確地使用兵力，造成銳不可擋的有利態勢；《虛實第六》，主要論述作戰指揮中要“避實擊虛”、“攻其必救”、“因敵而制勝”，中心講用“示形”欺騙敵人，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軍爭第七》，主要論述爭取戰場主動權的問題，提出了“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的軍事原則；《九變第八》，主要論述根據各種戰場情況靈活運用軍事原則問題，提出了“必雜於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行軍第九》，主要論述行軍、宿營和作戰的組織指揮及利用地形地物、偵察判斷敵情的問題；《地形第十》，主要論述地勢的種類與作戰的關係及在不同地形條件下的行動原則，還提出了“視卒如愛子”的觀點；《九地第十一》，主要論述九種不同作戰地區及其用兵原則，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襲擊的作戰思想；《火攻第十二》，主要論述火攻的種類條件和實施方法。《用間第十三》，從戰略的高度論述了使用間諜的重要性及其各種間諜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敵情“不可取於鬼神”，“必取於人”的進步觀點。

《孫子兵法》詞約意豐，內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戰爭的一般規律，這些規律不因時間、地點、作戰方式、方法的改變而改變。如在軍隊建設方面，非常重視和強調將帥的地位和作用。它重視戰略謀劃，反對輕易用兵，主張“慎戰”、“全勝”，“不戰而屈人之兵”；它強調戰術的靈活性，提出“兵無常勢”，“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因敵而制勝”，要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作戰物件等而採取不同的打法，要“致人而不致於人”等。它的治軍思想，在於文武兼施、刑賞並重。認為“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又如書中提出“攻其不備、出其不意”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歷來被稱為“兵經”。《孫子兵法》中關於作戰方針、作戰形式、作戰指導原則等的論述，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思想為基礎的。在世界軍事史上閃爍著永遠的光輝（參看1989年《辭海》縮印本第1264頁《孫子》、第1265頁《孫子兵法》，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孫子兵法》第121——第126頁）。

2、《吳子》。《武經七書》之一，吳起撰。吳起（約公元前440～前381年），衛國左氏（今中國東部山東定陶縣西）人，戰國初期著名的軍事家、軍事理論家和改革家，為楚國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吳起的兵書在戰國和西漢時期很受歡迎。《韓非子·五蠹》中說：“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也稱“《吳起兵法》世所多有。”《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其影響幾乎能和《孫子兵法》相比。收入本書的《吳

子》，分上、下兩卷，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 6 篇。基本採用魏文侯、魏武侯與吳起對話的形式。

《吳子》軍事思想頗為豐富。它總結了戰國初期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提出一些重要思想。如“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戰略思想；隨機應變的戰術思想；“以治為勝”、“教戒為先”的治軍思想；“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多”的樸素的軍事哲學思想等。《吳子》繼承並發展了《孫子兵法》軍事思想，反映了戰國時期戰爭規律和特點，具有重要的軍事史料價值和軍事學術價值。為歷代兵家所重視（參看 1989 年《辭海》縮印本第 822 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吳子兵法》第 126—130 頁）。

3、《司馬法》。《武經七書》之一，據《史記》載，戰國時齊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馬法，而把穰苴兵法附其中，定名《穰苴兵法》。《漢書·藝文志》稱《軍禮司馬法》，共 155 篇。《隋書·經籍志》題為司馬穰苴撰，其後著錄多沿此說。今本只存卷上、卷中、卷下，有日本靜嘉堂所藏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刊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武經七書》系統諸本。司馬穰苴，春秋時齊國大夫，精通兵法，田氏，名穰苴，因其任大司馬，故名。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載，他為春秋末期齊國人。齊相晏嬰認為他“文能附眾，武能威敵”，推薦于齊景公任將軍。他治軍嚴整，執法不阿，精於兵法，以戰勝晉、燕，名於後世。

《司馬法》的篇目和內容有：《仁本第一》，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目的、起因和對戰爭的態度、發動戰爭的時機，並追述了古代的一些戰法；《天子之第二》闡述君臣之禮，治國、教民和治軍的不同方法，記述了古代的一些作戰形式、兵器配置、戰車編組、旗語徽章、賞罰制度等；《定爵第三》，講的是戰爭的準備、戰場指揮、佈陣原則、偵察敵情、戰時法規等問題；《嚴位第四》，主要闡述戰略戰術和將帥指揮，以及勝利後注意事項等；《用眾第五》是講戰略、戰術及戰場指揮等。

《司馬法》包含有春秋以前已經落後的軍事原則，如“成列而鼓”等，但是它更為豐富的是根據春秋末期和戰國初的戰爭實踐經驗而提出的進步軍事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一是“相為輕重”的進步思想。“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嚴位第四》）二是“以戰止戰”的戰爭觀。在對戰爭的態度上主張“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同時認為“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三是以仁義為本的治軍思想。它所闡述經國治軍思想的核心是禮、仁、信、義、勇、智“六德”，強調“以仁為本”，“以禮為固”。在作戰方面主張要先行“五慮”（謀劃），創造取勝條件。在闡明軍事原則時，注意從眾寡、輕重、治亂、進退、難易、固危、強靜與微靜、小懼與大懼等各種關係分析問題；用相為輕重的觀點去判斷敵對雙方變化等等。

《司馬法》除反映戰國中期戰爭的某些特點外，較多地輯存了春秋以前的軍事制度和軍事思想，為歷代兵家所重視（參看 1989 年《辭海》縮印本第 120 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司馬法》第 130—136 頁）。

4、《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又稱《李衛公問對》，簡稱《唐李問對》，包括上、中、下 3 卷，舊題李靖所撰，《武經七書》之一。它是一部記錄唐朝名將李靖軍事思想的兵書，也是一部問答體兵書。李靖（571—649），字藥師，雍州三原（今陝西三原縣東北）人。唐初傑出的軍事將領、軍事理論家。由於新、舊唐書都沒有記載此書，故後人懷疑是偽作。它是以太宗李世民和衛國公李靖關於軍事問題的問答形式編成。

《李衛公問對》10300 餘字，全書內容比較廣泛。它既有對歷代戰爭經驗的總結和評述，又有對古代兵法的論釋和發揮；既講訓練，又講作戰；既討論治軍，又討論用人；既有對古代軍制的追述，又有對兵學源流的考辯。但主要內容是講訓練、作戰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等。如主張從實戰需要出發訓練部隊，達到在戰鬥中“鬥亂而法不亂”、“形圓而勢不散”、“絕而不離，卻而不散”的目的。又如它重視訓練方法，認為“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等。

《李衛公問對》繼承了春秋戰國以來的軍事思想，並提出了一些新的軍事理論，見解獨到。如對《孫子》“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解釋不囿於曹操等舊說，並批評他們用力量的強弱來解釋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對於攻守問題，它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如“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等。此外，它對《孫子兵法》戰略、戰術思想做了進一步發揮和闡述。它從“奇正”、“虛實”、“主客”等命題入手，主要探討奇正問題。認為奇與正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提出“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還指出“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鬥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等。它用奇正的觀點來解釋進退、攻守等軍事問題，大大發揮了孫子的奇正學說。南宋戴少望《將鑒論斷》說：“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可見它在中國兵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參看 1989 年《辭海》縮印本第 1432 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李衛公問對》第 165—170 頁）。

5、《尉繚子》。《武經七書》之一，作者及成書年代不詳。一說為秦始皇時的大樑人尉繚，一說為戰國中期魏惠王時的軍事家尉繚，本文從後說。《漢書·藝文志》“兵形勢家”類著錄有《尉繚》31 篇，“雜家類”又錄有《尉繚》29 篇。1972 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尉繚子》殘簡，說明此書在西漢時已流行，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時代。收入本書為 5 卷，約 9000 字，共 24 篇。即卷一：天官、兵談、制談、戰威；卷二：攻權、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卷

三：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卷四：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卷五：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

尉繚子廣議用兵之道。它把軍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為“植”（枝幹）、“種”（根基）和“表”、“裏”，指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主張富國強兵：“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則國富。富治者，民不發軔，車不出暴而威制天下”；依靠人事，重視“廓廟”決策，“先料敵而後動”；強調“號令明，法制審”；重視將帥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模範作用，要求將帥秉公執法，恩威並施；重視部隊的行政建設；注重軍隊的訓練；重視賞罰，提出“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殺（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思想。它繼承並發展了《孫子》、《吳子》等的軍事思想，提出“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進步觀點。認為戰爭有正義與不義之分，“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主張“王者伐暴亂”的戰爭要以“仁義”為本等。

《尉繚子》是一部具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兵書。自問世後，受到歷代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重視（參看 1989 年《辭海》縮印本 808 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尉繚子》第 141—147 頁）。

6、《三略》。又稱《黃石公記》、《黃石公三略》，《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源出於太公薑尚，經黃石公推演以授張良，故舊題黃石公撰。《隋書·經籍志》稱“下邳神人撰”，均不可考。今人研究約為秦漢之間無名氏作品。

《三略》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專門從戰略上論兵的兵書。共 3800 餘字，分上、中、下 3 卷。上卷多引《軍讖》語，主要通過對“設禮常，別奸雄，著成敗”的分析，論述以“柔弱勝剛強”為指導、以收攬人心為中心，以“任賢擒敵”為宗旨的治國統軍的戰略思想及其實現的方法。中卷多引《軍勢》語，主要通過“差德行，審權變”，論述君主馭將統眾的謀略。下卷則是作者的論述，主要內容是“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強調以“道”、“德”、“仁”、“義”、“禮”治國，從保民的目的出發，並主張將卒並重。

《三略》主張以道家謀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則禦將卒、以陰陽家觀點識形勢、以墨家人才觀尚賢納士，形成雜取諸家之長而又相輔相成、渾然一體且又獨具特色的軍事思想體系。側重從國家大戰略的角度考察軍事問題，注重論述治軍禦將等。此外，它對將帥、士兵和民眾的各自作用作了中肯的論述：“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眾也。”“庶民者，國之本。”“以弱勝強者，民也。”南宋晁公武稱：該書“論用兵機之妙、嚴明之決，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三略》問世後，對後代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參看 1989 年《辭海》縮印本第 18 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黃石公三略》第 158—161 頁）。

7、《六韜》。《武經七書》之一，6卷，共60篇，其中部分內容已佚失。《隋書·經籍志》注云：“周文王師董望撰”，實為後人所著，成書約在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間。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的漢墓曾有《六韜》殘簡出土。清人孫同元、王仁俊等均輯有《六韜逸文》。其版本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武經七書》本等。

《六韜》包括《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文韜》主要討論治國用人的政治戰略；《武韜》著重論述如何用兵的軍事戰略；《龍韜》闡述軍隊的組織、獎懲、將帥的選拔和修養、軍事秘密通訊、奇兵的運用、偵伺敵軍的方法以及兵農合一的思想；《虎韜》主要討論各種特殊天候、地形及其它不利條件情況下的進攻和防禦戰術，並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種類、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佈陣原則；《豹韜》主要講述森林、山地、河流、險隘地區作戰和防敵突襲、夜襲以及遭遇戰的戰術。《犬韜》主要論述軍隊的指揮調動，擊敵時機，練兵方法，步、車、騎兵的組織、協同和各自的戰法。

《六韜》“規模闊大，本末兼該”（清朱墉《武經七書匯解》），內容非常豐富，是先秦兵書中集大成之作。全書論述了政治與戰爭的關係，主張“同天下”，反復強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因此要取得民眾擁護。在軍事理論方面，它對中國古代軍隊的指揮機構和車騎步戰的關係記述也更為具體。如《王翼》篇描述了當時軍隊指揮機構的情況，說“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並闡明其各自職責。它還論述了作戰、治軍等問題。如在作戰指導上，主張引兵深入諸侯國的進攻戰，指揮專一，因情用兵。在使用兵力上，主張“必有分合之變”；圍城攻邑則要集結三軍，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在治軍方面，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要求將領具備勇、智、仁、信、忠等德行，不僅要諳熟戰爭中各種戰略、戰術，而且要有“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的風範，執行嚴格的戰場紀律等。

《六韜》詳細記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古代武器裝備的形制和戰鬥性能、古代軍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保存了豐富的古代軍事史料。問世後，受到歷代政治家、軍事家的重視，曾被譯成西夏文，在少數民族中流傳（參看1989年《辭海》縮印本第392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六韜》第147—154頁）。

## 第2冊：《孫子音注》

《孫子音注》，明版《孫子兵法》，原著孫武，明代解元鐘吳、何守法校音、解注，萬曆三十二年（1604）出版。全書共分6冊，“系參照11家集注，及張寶、鄭友賢、鄭希山、楊魁、趙虛舟等注解——‘諸說而全注之’，並益以‘鄙見’，——旁搜博采，寒暑不辭，稿凡五易，紙及千張。”何守法，浙江人，約生活於明嘉靖至萬曆年間，其生平及生卒時間均不詳。

《孫子音注》包括題解和點注兩部分，而每卷內容又分題解、原文、注釋、注音和批評5部分。題解部分，指出該篇的主要內容。如《始計第一》的題解：“此篇凡五節，首兵者，至察也，是一頭；次至不勝，言君與大將經校於廟堂之上，而勝負可決……”。注解解釋原文部分，相當透徹，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形篇》：“……銖銖積水總是喻攻守之形。然一篇雖以（軍）形為名，而議論反復有如風生，中間不露一形字，至末方點出，何其妙歟？學者最宜深味。”接著以戰例為佐證。又如：“篇名雖曰作戰，而所載乃實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者，何也？”何守法對此疑問的答案是“亦以行師必先備乎此，而後可作而用之耳。”（《作戰》），再如對《九變》的內容的解釋。《孫子兵法》原書並未對此作出明確的列舉，而後世注釋的人也各有不同的見解。何守法認為：“自（此）圯地至不爭為九變，君命句則總言之，正見為變也”。又解釋道：“九變者，用兵之變化有九也，常之反為變。凡用兵有常法，有變法。如上篇軍爭之法，是道其常也。此篇皆以不必爭為言，則變矣”（參看《鈕先鐘：《孫子》三論——從古兵法到新戰略》），這種解釋頗有見地。

《孫子音注》是解讀《孫子兵法》內容的重要作品，它明顯地反映出明朝後期的禦侮思想。對研究《孫子兵法》、先秦時期音韻學、明代兵書版本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 第3冊：《汪氏兵學三書》

《汪氏兵學三書》，又稱《三家兵法》，為清代汪宗沂輯編的一部軍事叢書（輯佚本）。包括《太公兵法逸文》、《武侯八陣兵法輯略》、《李衛公兵法輯本》。這3部中國著名兵書古已散佚，部分內容散見於類書、政書等史籍中，汪宗沂博采諸書，匯輯成編，並一一注明出處，間有評論性按語。據《太公兵法逸文》自序可知，此書成書於光緒五年（1879），當時並稱為《三家兵法》。汪宗沂（1837—1906），字仲伊，號弢廬處士，安徽歙縣人，清末中國著名兵學家，光緒年間進士，曾任山西知縣。他精通《禮經》，洞悉樂呂（律），著作有《周易學統》、《管樂母音譜》、《三湘兵法》等。

1、《太公兵法逸文》，共1卷，7篇。《太公兵法》，即姜太公兵法，《漢書·藝文志》中記載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的《兵八十五篇》，就是人們通常所說《太公兵法》。而“汪宗沂輯《太公兵法逸文》實兼《六韜》、《金匱》、《陰謀》三書。”其範圍大致有：《說苑》引《太公兵法》；《皇覽》、《意林》引《金匱》、《陰謀》；《左傳》、《國語》、《大戴禮》、《史記》、《漢書》、《通典》、《御覽》引《周書》；《逸周書·武稱》、周、漢、隋、唐人引“兵書”、《軍志》、“兵法”，如孫武、蕭統、蕭吉、歐陽詢等；唐人書引《六韜》佚文，如《群書治要》、《黃石公記》佚文；以及輯者認為今本《六韜》近古者。汪氏將這些佚文以類相從，別為篇第。所采輯之書其中確有一些古色古香、涵意深刻的論兵要言者。如“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意

林》），“故戰不必任天道，饑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為寶”（《群書治要》），“王得眾人之心得以圖不道，則不戰而勝矣”（《說苑》），“智與眾同者非人師也。大智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不能成事”（《御覽》）等等。《太公兵法逸文》是研究董太公兵法的重要參考資料。

2、《武侯八陣兵法輯略》，1卷。它是從《水經注》、《太平環宇記》、《晉書》、《太平御覽》、《昭明文選》、《通典》、《北堂書抄》、《玉海》、《杜牧孫子注》等史籍中輯錄出的有關諸葛亮八陣的資料，內容涉及八陣圖遺跡、八陣布列及各部分名稱等。每條資料後均有汪氏的按語，後附《用陣雜錄》，系從有關史書上輯錄的運用陣法的資料，共14則。

3、《李衛公兵法輯本》，3卷，共3篇。是從唐杜佑《通典》、《杜牧孫子注》、宋《太平御覽》、《武經總要》、明唐順之《武編》等書中所引佚文，參互輯錄，分類編排，區分為上、中、下3卷。內容有：一將務兵謀，二部伍營陣，三攻守戰具。關於輯佚的原則，在凡例中輯者指出：本非《李衛公兵法》而他書誤注者不錄；凡佚文在《通典》未注明著者而又不見他書注明者，無憑取信，暫從缺。說明輯佚的標準是比較嚴的。書後附有《舊唐書李靖傳考證》，此書將散佚的李靖兵法資料彙集成帙，為研究李靖軍事思想提供了很大方便。

《汪氏兵學三書》是研究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現存版本有清光緒甲午（1894）避舍蓋公堂校刊本、光緒乙未（1895）浙西村舍匯刊本等（參看《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汪氏兵學三書》第556—559頁）。

#### 第4冊：《陰符經注》、《風後握奇經解》、《黃石公素書注》、 《心書》、《何博士備論》

1、《陰符經注》，1卷，是一部注釋、解讀《陰符經》的書。據《新唐書·藝文志》載：《張良經》一卷，《張氏七篇》七卷（張氏即張良）。張注《陰符經》收入作注者12人，集注62條。其中漢以前的作注者有廣成子（2條）、老子（1條）、孫子（1條）、範蠡（1條）、吳子（1條）、鶡冠子（1條）、鬼穀子（5條）、伊尹（5條），漢至唐代的作注者有：姜太公（8條）、張良（14條）、諸葛亮（5條）、李筌（18條）。本書署名張良注，從內容看，實際上是唐代以前的《陰符經注》彙集。張良作注不是最多，只有14條，言簡意賅。但為何稱張良注？不詳。張良（？—前186），字子房，漢初城父（今安徽亳州）人。西漢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開國元勳之一。

《陰符經》全稱為《黃帝陰符經》，或稱《軒轅黃帝陰符經》，有兩種本子：一種出於唐代李筌，3章，共300餘字（據《道藏》本《黃帝陰符經疏》），全文止於“我以時物文理哲”句；一種出自唐代張果（即“八仙”之一的張果老），于



李筌本後多出 100 餘字，不分篇章。《道藏》白文本 400 餘字，亦分為 3 章，乃後世傳本之一（本文為《四庫全書》本）。《陰符經》舊題黃帝撰，一說是唐朝李筌在河南省境內嵩山岩石壁中發現的（為偽託）。李筌，唐代著名的軍事理論家、道家、隱士，號達觀子，生卒年不詳，隴西（今甘肅境內）人。

該書內容十分豐富，上篇主要是論說天道與人事、政治的關係；中篇主要是闡述以自然天道為法則以及富國安民的道理；下篇主要是談論兵學的。如守時發機，不為聲色所擾；明瞭事物變化之理，掌握應變之術；天道、人事相參驗、隨機應變等。不過各家對《陰符經》內容看法並不一致。有的認為它是談道家修養方法的書，有的認為它是縱橫家的書，所談都是權謀術數，也有人認為它是兵家的書，所談為克敵制勝之道。本大系以兵家之書收入。

據《陰符經疏》釋義，“陰，暗也；符，合也。天機暗合於行事之機，故曰陰符”。即是說政治和軍事鬥爭的策略計謀必須暗合于自然天道。張注《陰符經》是對《陰符經》的闡釋、引申，它一句一釋（前列原文，後添注釋），按人物先後順序，自先秦至漢唐，以“X x曰”進行，各家注釋各有特點。如“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姜太公注釋說：“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得）”。姜太公用相輔相成的原理強調說明事物是互相轉化的。所謂五賊，“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接著他解釋說：“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而“五得”就是“得命、得物、得時、得功、得神”。其中得神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精神世界裏運用神機妙算，以達到“以小取大，因小滅大”的目的。又如《陰符經》中說：“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鬼穀子解釋說：“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沉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這是說大地、萬物、人互相擷取和殘害，只要取之以時，措施得當，不違背常理，就能各得其宜，天、地、人也就相安無事了。它是用事物相生的原理，說明事物之間要各安其位，包含著辯證法的原理。再如：“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張良注釋說：“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一源。”這裏借瞽聾之短長比喻用兵要揚己之長，避己之短，就能事半功倍。他如“恩生於害，害生於恩”，“陰陽相勝之術”，“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等等，具有進步思想，對後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除上面介紹的 12 家注釋外，還有杜光庭、夏元鼎、陸長庚、呂坤、李光地等 40 餘家注疏本（參看 1989 年《辭海》縮印本第 472 頁）。

2、《風後握奇經解》。1 卷，是一部注釋、解讀《風後握奇經》的書，相傳經文為黃帝臣風後撰，西周初姜尚為之引申，漢武帝時公孫宏作解。

《風後握奇經》為中國古代論述八陣的書，又名《握機經》、《幄機經》，1 卷，380 餘字（一本 360 餘字，另附《風後握奇經解續圖》1 卷，舊題晉武帝時西平太

守馬隆撰《八陣綜述》，1卷，《李衛公問對》中有“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語。據後人考證，《握奇經》成書較晚，《宋史·藝文志》始見著錄。南宋朱熹認為該書是“唐李筌為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認為是唐代以來好事者據唐獨孤及《八陣圖記》推衍而成。

該書指出：“八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佈陣用兵，要根據“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和兵力多寡等情況靈活運用。由於經文簡略，關於四正四奇的方位，在佈陣和作戰時的作用，兩者變換演化關係，後人解釋不盡一致。一說釋為：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天又分為天衡、天前沖、天后沖；地分為地軸、地前沖、地後沖。以天衡、地軸、天地前後沖、風、雲布為八陣。其中地軸、地前後沖居內層，天衡、天后沖居外層，四偶皆為風陣雲陣。臨陣時，四正之八陣轉變為龍、虎、鳥、蛇四奇之八陣以應敵。故“奇即正之變，非在正之外”。八陣為一整體，而每陣又有其獨立性。故合而為一，離而為八。每陣隊八，八陣共為64隊。八陣之外，另有少部分兵力為遊軍，稱為“餘奇”或稱“握機”，即機動兵力，由主將直接調遣。游軍在佈陣時分踞兩端（包括前後左右）護陣；臨陣時應策應本陣相機應敵。也有另一種解釋為：八陣為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等8個以不同旗幡服飾作標誌的小方陣組合而成的一個大方陣。四方為四正，四偶為四奇。即部署在前、後、左、右各小方陣為正兵，而當四方正兵向四偶隙地機動時便是奇兵。所以四正為體，四奇為用。餘奇為主將居中控制機動兵力，掌握此奇零之兵又稱握奇。八陣的佈陣原則“薄中厚方”，主張“居中禦外”，起著“居重禦輕”的作用。八陣成一整體時，則“合而為一，平川如城”；分開時，則“散而為八，逐地之行”分開時則“散而為八，逐地之行”（《八陣總述》）等等。

《握奇經》的陣法理論多為後世所重，有多種釋本傳世。收入本書的為漢公孫宏解。公孫弘（西元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西漢齊地菑川國薛縣（今山東壽光南）人。他出身於鄉鄙之間，漢武帝時位極為相（參看1997年北方方正電子出版社《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風後握奇經》第262—265頁）

3、《黃石公素書注》。1卷，是一部注釋、解讀《黃石公素書》的著作。《黃石公素書》又名《鈐經》、《玉鈐經》，它是一部類似語錄體（格言式）的書，相傳為秦人黃石公著。黃石公，事蹟見《史記·留侯世家》，稱其避秦世之亂，隱居東海下邳。三試張良，授與《太公兵法》，張良後來以黃石公所授兵書+助漢高祖劉邦奪得天下。《宋史·藝文志》載：“有黃石公《素書》一卷，張良傳。”《四庫全書》收在子部“兵法”類中，並錄有宋代宰相張商英所作注釋。然而，它作為一部偽書，已無疑義。明代以後認定是張商英偽撰，此後成為定讞。張商英（？—1122），字天覺，宋大觀年間為尚書右僕射，曾學浮屠法，喜講禪理。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徽宗頗憚之，遂蒙忠直之名。後出知河南府等職。

全書分 6 章，即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求人之志章第三、本德宗道章第四、遵義章第五、安禮章第六，共 132 句。雖只 1300 餘字，但字字珠璣，句句名言。在精準地認識世道、把握人性的基礎上，對人生謀略給出了高屋建瓴的指點。它圍繞著“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展開論述，主張“潛居抱道，以待其時”，修德行仁，遵義尚禮。教育人們不要損節背理，要謙恭行善。在軍事方面，重視設權定謀，指出：“設變從權，所以解結”，“長莫長於博謀”，“陰謀外泄者敗”，“患在不預定謀”；重視民心民意，認為“民怨傷國”，“民困國殘”；重視人才的選拔和正確使用，認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國將霸者士先歸，邦將亡者賢先避。”在戰爭中，主張根據各種人才的特點進行戰鬥分工，揚長避短，人盡其能。“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敵，不可使分陣；廉可使守主，不可使應機，五者各隨其材而用之。”等等。

張商英注釋《黃石公素書》，採取逐句注釋的方式進行，頗得其義。如“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張商英注釋說：“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為一；一之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說明當道德教育不起作用時，只好提倡仁愛；當仁愛之心日益淡薄之時，就要用正義，當正義感也喪失殆盡後，就只能用法規性的禮制來約束民眾了。因此，道、德、仁、義、禮，這五個方面是天道因時因勢之不同而權變使用的結果。又如“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張商英注釋說：“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張商英從滿足萬物之欲求的角度解釋了‘德’的內涵。說明只有以道德為立身處世根基，順天道而行，才能獲得成功。如果不講道德，欲望終將落空。這種解釋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陰符經》第 178—1180 頁）

4、《心書》，宋朝稱《將苑》，舊題諸葛亮撰，共 50 篇，約 5000 字。南宋《遂初堂書目》始有記載，明王士騏編《諸葛亮集》將其收入，現有明正德年、萬曆年、民國年間及 1926 年成都昌福公司鉛印本等版本傳世。諸葛亮（181~234），字孔明，號臥龍，琅琊陽都（今山東沂南）人，蜀漢丞相，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東漢末年，受劉備三顧茅廬，先後輔佐劉備、劉禪父子 28 年，創建了蜀漢政權，對西南地區的政治統一、經濟發展和民族團結作出了重要貢獻。

《心書》博采《孫子》、《吳子》、《尉繚子》、《六韜》、《三略》、《左傳》等兵書史籍中的論兵妙語，分門別類加以闡述，言簡意賅，自成體系，概括了古代為將之道。其內容大致可分為 5 個方面：一是關於將領道德修養的提高的，主要包括“將材”、“將器”、“將志”、“將善”、“將剛”、“將強”，如它對將帥進行分類研究，認為將材有 9 種：即仁將、義將、禮將、智將、信將、步將、騎將、猛將、大將，還有十夫之將、百夫之將、千夫之將、萬夫之將、十萬人之將、天下之將。意在選拔任用將帥要量才而選，量力而用；二是論述君主與將領的關係，主要表現在“兵權”、“出師”、“假權”等篇的論述中，它認為將帥關係著國家興亡、戰爭勝敗，重申“將之出，君命有所不

受”的古訓，因此要給予將帥自主權；三是將領的用人之道，包括“逐惡”、“知人性”、“擇材”、“腹心”、“三賓”、“勵士”、“和人”等，如重視收攬和掌握有特長的人材，“必有博聞多智者為腹心，沈審謹密者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四是將領的軍事素質，包括智謀水準，偵察的運用和天時、地利等自然條件的了然於心和巧妙運用，如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要懂得“兵機”、“兵勢”，“因機而立勝，”“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要熟悉戰場地形地物，探明敵情，“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必先探敵情而後圖之”，要懂得各種地形氣候條件下的戰法，如林戰、叢戰、谷戰、水戰、夜戰等。它要求將帥不恃強，要有“五善四欲”，它還要求將帥力爭五強，杜絕八惡，它提出了將帥應遵守的15條紀律；五是嚴明軍紀，體現在“習練”、“軍蠹”、“重刑”、“整師”、“威令”等，如“誠之以典型，威之以賞罰”等。

《心書》是我國古代軍事史上第一部專論為將之道的書，是中國古代的將才學。它一事一議，論證全面、具體，言簡意賅，堪稱古代為將之道的集大成者，其中凝結了諸葛亮的領導藝術和識別、選拔、任用將領的奧秘，該書受到了歷代軍事家的重視和推崇，被認為是統軍帶兵的必讀之書。（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陰符經》第161—165頁）。

5、《何博士備論》。何去非撰，1卷，28篇（今本缺2篇），現存各種版本均為26篇，佚2篇。李浴日先生在本大系目錄中記為27篇，多“鄧禹”一篇，但實無內容。他在“鄧禹”下注說：“缺，謹按，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此一篇，系從陳君子准處所錄，附注其目於此。”篇目是：六國、秦、楚漢、晁錯、漢武帝、李廣、李陵、霍去病、劉伯升、漢光武、魏上、魏下、司馬仲達、鄧艾、吳、蜀、陸機、晉上、晉下、苻堅上、苻堅下、宋武帝、楊素、唐、郭崇韜、五代。何去非，生平見《武經七書》簡介。

《何博士備論》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人物評論集。該書對戰國至五代的興廢成敗和22個軍事人物的用兵得失進行了評述，旨在尋求歷史借鑒。它認為，不能籠統地肯定或否定戰爭，戰爭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順逆之情”、“利害之勢”。它強調，要贏得戰爭的勝利必須有“智”。認為“智”勝於“勇”，楚漢戰爭中劉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戰勝項羽；“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濟智”，認為隋朝楊素堪稱智勇兼備。本書對“智”在戰勝中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論證。強調認清主要敵人，以戰國時六國之亡，“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仇”為鑒；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晉滅吳所以勝、劉濞之所以敗為例證；主張靈活用兵，“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因而推崇韓信、曹操“出奇應變”，多謀善斷。為了以智勝敵，主張用“謀夫策士”組成自己的智囊，東漢末孫堅所以“功業不就”就是無人“發智慮之所不及”而致。它還提出君將要和諧，應賦予將領機斷指揮之權，認為孫武、司馬穰苴、周亞夫、諸葛亮、王猛等歷代著名將相都是“深得于君”權不中禦，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

《何博士備論》褒貶歷史人物不囿舊說，蘇軾曾讚譽“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但其對某些人事的評論，亦有偏頗之處。

### 第 5 冊：《太白陰經》

《太白陰經》，唐李筌撰，10 卷，共 100 篇。它是李筌花 10 年心血寫成的兵書，內容豐富。該書是唐代諸家兵書中僅存的一部完書，“在兵書撰著史上，是既《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司馬法》之後又一部具有重要軍事思想價值的兵書。它對先唐諸兵家兼采並蓄，並進一步闡發推演，頗多發明，內容旁及軍事領域的各個方面。”（孫繼民等譯《太白陰經》）

《太白陰經》介紹了古代許多軍事知識，諸如軍儀典禮、攻防戰具、偵察通訊、行營警備、糧草行裝、戰場建設、戰陣隊形，以及古代軍中祭祀、占卜活動等。其中比較有價值的是前 5 卷，它批評了當時迷信陰陽五行的思想。在卷一《人謀上·天無陰陽》裏，他認為陰陽不能決定勝敗、存亡、禍福、善惡，“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指虛無之狀，不可以決勝負，不可以制死生。”人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任賢使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不禳祀而得福。”在卷一《人謀上·地無險阻》裏又指出：“天時不能佑無道之主，地利不能濟亂亡之國。地之險易，因人而險，因人而易。”認為人的勇怯不是天生的，也與生長的地方無關，而全在於培養鍛煉和使用是否得當：“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怯人使之以刑則勇，勇人使之以賞則死。”總之，勝敗、存亡在於人謀。人謀的最高標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他認為“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善師》）主張以仁義道德為本，“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貴和》）。他崇尚智謀，在軍事上重視廟算，乘敵之隙，攻其無備，揚己所長、避己所短，見利而進、無利而止等。他還主張發展農業生產，實行軍屯墾田，以使國家富強，軍隊強大。後 5 卷多為非科學的內容，如輯錄了大量陰陽、占卜之類的東西。如《鑒人篇》等雜有許多糟粕。

《太白陰經》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保存了古代許多軍事資料，如保存了唐代有關山川、道里、關塞、四夷等資料，具有史料研究價值（參看 1989 年《辭海》縮印本 727 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太白陰經》第 443—447 頁）

### 第 6 冊：《虎鈴經》

《虎鈴經》，宋代許洞撰，凡 20 卷，210 篇，共論 210 個問題，許洞(976—1015)，字洞夫，一作淵夫，北宋吳郡（今江蘇吳縣）人，咸平三年（1000）進

士。他是北宋早年的一位戰略學家，擅長武術，精通軍事理論。曾任雄武軍推官、均州參軍等職。該書現存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庫全書》、《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粵雅堂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

《四庫全書》稱，許洞在《虎鈴經》中“匯輯舊文，參以己意”，“其書指陳兵法上至占候、陰陽，下至醫療、人馬，一一詳備”。它以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為主旨，兼及風角占候、人馬醫護等內容。許洞認為天、地、人三者的關係應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後攻之必克敵也”，重視人（主要是將帥）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為王要依靠將帥，將帥要依靠士卒，“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也。”要求將帥應“觀彼動靜”而靈活用兵，做到“以虛含變應敵”。儘管天時有吉凶，地形有險易，戰勢有利害，如能吉中見凶、凶中見吉，易中見險、險中見易，利中見害、害中見利，就能用兵盡其變。他還認為，要取勝須“以糧儲為本，謀略為器”。未戰之前要“先謀”：欲謀用兵，先謀安民；欲謀攻敵，先謀通糧；欲謀疏陳，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欲謀守據，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賞罰等。既戰之後，一要善於“奪恃”：奪氣、奪隘、奪勇等；二要善於“襲虛”：以佯動、誘敵擊其虛；三要“任勢”：乘機擊敵懈怠，設伏擊敵不意，乘勝擴張戰果等。還強調“逆用古法”，“利在變通之機”。該書在體例上，按類匯輯，分別闡述。彙集的與軍事有關的天文、曆法、記時及識別方位等知識，有許多為過去兵書所少有。此外，還創造了不少陣法，“惟其第九卷飛鸞長虹，重複八卦及飛轅寨圖為洞自創之新法。”（《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它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李筌兵學中的軍事思想，詳細記載了古代各種軍事知識。它先于宋仁宗時官修的《武經總要》而成書，是當時一部先進的軍事學著作，具有重要的軍事學術價值和軍事史料價值。它和先秦兵書相比，理論色彩減弱，實用性（指當時）增強。但書中少量篇章有天人感應等荒誕迷信之談，則不足取（參看 1989 年《辭海》縮印本第 2252 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虎鈴經》第 443—447 頁）

## 第 7 冊：《投筆膚談》、《陣紀》、《百戰經》、《兵經》

1、《投筆膚談》，西湖逸士撰，明何守法撰音、點注。共 2 卷（上、下），13 篇。自稱“仿《孫子》之遺旨”，每卷分題解、原文、注釋、注音和批評 5 部分。題解指出該篇的主要內容和與其他篇的聯繫，注解解釋原文並以大量戰例為佐證，可視為以戰例解釋古代兵法的著作。上卷包括本謀、家計、達權、持衡、諜間、敵情 6 篇，主要論證戰爭宗旨和用兵在於事先謀略，講述用間之法。各篇的主要內容是：《家計》、《達權》突出地闡述了立於不敗之地的謀略思想，“不虛營而實陣，不重戰而輕守，不緩禦而急攻，不先彼而後己”，強調要通達權變，做到自備不虞，然後乘敵致勝。《持衡》論述攻守之災利，主張違其災，乘其利，攻其心，守其氣，神於機變。《諜間》講用間之方，《敵情》述知敵之法。下卷包括軍勢、兵機、戰形、方術、物略、地紀、天經 7 篇，主要論述選將、治軍之道和用兵之機巧在於變化莫測，強調充分利用當時的新技術和科學知

識在戰爭中的影響和作用。各篇的主要內容是：《軍勢》稱：“軍勢者，三軍之體勢也。其轉移虛實強弱，全在於將。將非賢能不可，任之不專亦不可。將賢而任專，斯軍勢強實，而戰無不力矣。”並例釋：“三軍之勢，如人一身。大將，心也；士卒，四體百骸也；軍需輜重，飲食也。教練紀律，體悉賞罰，所以培植元氣，振厲精神也。是三軍之勢，莫重於將，選將之道，不可不慎也”。在強調將帥作用的同時，亦注重訓練士卒。認為雖有名將，若士卒未經訓練，亦不能打勝仗。只有德才兼備的將帥，指揮訓練有素的士兵，才會銳不可當，所向無敵。

《兵機》論用兵之機巧在於變化莫測。《戰形》論列交戰雙方的形勢，以因形措勝。《方術》、《物略》、《地紀》、《天經》提出了不僅要利用天時地利，還要利用各種自然物的性能，要“察物之理，究物之用，總括其利，不遺微小”，以奪取戰爭的勝利。全書邏輯嚴謹，重點突出，凡用兵治軍均有論述，並重視科學技術，明顯地反映出明朝後期的禦侮思想。但“方術”中有些怪誕神異內容，則無價值（參看顧明遠主編、1990—199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辭典》及1989年《辭海》縮印本第763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投筆膚談》第213—219頁）。

2、《陣紀》，4卷，66篇，4.8萬餘字。明何良臣撰，它是明代一部關於選練與作戰的兵書。何良臣，字惟聖，號際明，生卒年不詳，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明朝軍事家、詩人。

《陣紀》分募選、束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奇正、眾寡、率然、技用、陣宜、戰令、戰機、摧陷、因勢、車戰、騎戰、步戰、水戰、火戰、夜戰、山林澤谷之戰、風雨雪霧之戰等，共23類，內容較為充實。它結合歷代用兵得失及明代軍制特點，主張以“選練為先”，並述用兵之法，且有所引伸發揮。認為練兵要“五教”（教目、耳、足、手、心），練膽、練藝相輔相成，練就武藝精、膽氣壯、進退熟、變號識，心同氣一的有節制之師。還主張選組“秘技隊”、“膽氣隊”、“敢死隊”等，以為“不時之使”。對作戰，強調掌握“戰機”，主張待機而動，因勢利導，靈活用兵。要詭秘自己行動，不予敵以可乘之隙；要發揮自己的氣勢，或擊其先動，或乘其釁生，擊敵於未固之前，斷敵必返之路；敵長則截之，敵亂則惑之，敵薄則擊之，敵疑則懾之，敵恃則奪之，敵疏則襲之；我退使敵不知我之所守，我進使敵不知我之所攻。此外，對兵器使用，陣法布列，兵力運用以及各種地形、氣候條件下的作戰方法都有所論述。《陣紀》中的建軍和作戰思想在繼承古代兵學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作者“身在軍中，目睹形勢”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論較切實近理，既有軍事理論價值，又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除萬曆刻本外，還有《墨海金壺》、《珠叢別錄》、《叢書集成》等版本（參看《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北方方正電子出版社，1997年4月版）。

3、《百戰經》，全稱《兵法百戰經》，2卷，由《兵法百戰經全卷》和《兵法百戰經下卷》兩部分組成。明王鳴鶴編訂，何仲叔參輯。王鳴鶴，字羽卿，武進士，驃騎將軍，江蘇淮安人。何仲叔，生平事蹟不詳。

《百戰經》篇幅較小，約 8000 餘字，但涉及軍事問題的許多方面，附圖 20 幅，圖文並茂。“全卷”有如下細目：地利總說、圯地、通形、掛形、支形、隘形、選能、兩翼遊兵、火攻藥法、騎射、安營機要。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論述地形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各種地形的特點及作戰方法。“全卷”以“王鳴鶴曰”開篇，接著列舉了《孫子》中提出的圯地、死地、通形、掛形、支形等各類地形概念，以吳子問、孫武答的形式，闡述了敵我雙方陷入上述地形條件時的作戰方法，其中有些思想與《登壇必究》相同。二是記述了選賢任能的原則和考選弓弩、鳥銃手的方法及標準，強調統軍作戰，務必選拔搜攬各方面的人才；主張要象春秋戰國時那樣，“雖雞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庭養，以為己用。”三是記述了明代的遊兵戰法和軍中賞罰制度。“下卷”彙編了明代以前和明代的兵法精粹。內容包括：軍誓、定惑、符契、鄉道、金鏡捷法淘金歌、測水準器等。其中金鏡捷法淘金歌是用《易經》對用兵時間的計算，有日局起例、時局起例、太乙起例等計算方法，截止時間為明代萬曆戊子年（1588）。測水準器則是古代用於軍事測量的儀器，還有用於指揮戰船的度杆等器物的介紹，最後有陸軍和水軍的陣營分佈圖。卷首均著錄“淮陰王鳴鶴編訂，古吳何仲叔參輯”。由此推知，“全卷”應為王鳴鶴所著，“下卷”系由何仲叔所輯。不過本書編排較亂，各部分之間缺乏內在聯繫；有的本應標目的內容沒有標出來，雜在其他類中，名不符實。該書刊本著錄為“板藏南陽石室”（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兵法百戰經》第 224—226 頁）

4、《兵經》，又稱《兵經百篇》或《兵經百字》，分上、中、下 3 卷，揭暄著。揭暄（1613—1695），字子宣，號韋綸，明諸生，明末清初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天文學家和數學家，江西廣昌人。據載，他“少負奇氣，喜論兵，慷慨自任。獨閉門戶精思，得其要妙，著為《兵經百字》、《戰書》，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傳》）曾起兵抗清，失敗後隱居，著作兵書。

《兵經百字》將軍事上各方面的問題概括歸納為 100 個字，每個字下都有一段論述，大體按權謀、形勢、陰陽的分類標準進行分類。按內容屬性分 100 字，包括智、法、衍 3 部（有的版本“部”作“篇”）。智部共收 28 個字，即：先、機、勢、識、測、爭、讀、言、造、巧、謀、計、生、變、累、轉、活、疑、誤、左、拙、預、迭、周、謹、知、間、秘，“智部者，計謀之事也。”（《讀兵書凡例》）主要內容是論計謀方略。法部收 44 個字，即：興、任、將、輯、材、能、鋒、結、馭、練、勵、勒、恤、較、銳、糧、行、移、住、趨、地、利、陣、肅、野、張、斂、順、發、拒、撼、戰、搏、分、更、延、速、牽、勾、委、鎮、勝、全、隱，“法部者，行紀之事也。”（《讀兵書凡例》）主要是論練兵、用兵之法。衍部收 28 個字，即：天、數、辟、妄、女、文、借、傳、對、蹙、眼、瞪、捱、混、半、一、影、空、無、陰、靜、閑、忘、威、繇、自、如。“衍部者，推極之事也。”（《讀兵書凡例》）主要論述天文、術數、偵察、通信等用兵的輔助條件。《兵經百字》結合作者自己的研讀心得以及明清之際的軍事實踐，用當時較為通俗的語言對古人的軍事思想進行闡述，並有所發展。



在戰爭觀方面，對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進行了具體發揮：“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為暴。”（《法篇·全》）主張“於無爭止爭，以不戰弭戰，當未然而寢消之。”（《智篇·先》）發生戰爭時，“定不攻自拔之計以全城；致妄殺之戒以全民；奮不殺之武以全軍；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驚，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軍方面，提出“毋聽讒，讒非忌即間也。故大將在外，有不俟奏請，贈賞誅討，相機以為進止。將制其將，不以上制將。”（《法篇·任》）“獻謀獻策，則罔擇人，偶然之見，一得一長，雖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進而無退，雖不善而不誅，則英雄悉致。”（《法篇·材》）還提出了“勝天下者用天下”的觀點。在論述以計破敵時，強調“我以此制人，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設一防。我以此防人之制，人亦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設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應增一破彼之破。遞法以生，踵事而起。”（《智篇·累》）。又指出：敵我雙方都力圖挫敗對方的計謀，這導致了戰爭的變幻莫測，但將帥必須全面而正確地估計各方面的情況及其變化才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強調將帥要善於以變制變，活用兵法。陰陽、主客、強弱之形無時不變，要善於因敵之巧拙，因己藝之長短，因將之智愚，因地之險易而靈活用兵。

《兵經百字》繼承了古代優秀軍事思想，理論性很強，內容比較豐富，而且不雜抄硬拼，語言也較簡練，具有一定軍事學術價值，在清代後期產生較大的影響。曾先後被收入《皇朝經世文編》和李鴻章的《兵法七種》（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兵經百字》第232—237頁）。

## 第8冊：《兵跡》

《兵跡》，清代一部分類輯述軍事史實的兵書，也是一部綜合類兵書。12卷，90000餘字。魏禧纂輯。魏禧（1624—1681），字叔子，又字冰叔，號裕齋，江西寧都人，明末褚生。明亡後絕意仕進，以散文著稱於世。喜談兵，有《兵跡》、《兵法》等兵書傳世。

《兵跡》分類編排，共14篇。包括歷代、列國、將體、將物、將獸、將能、將效、華境、華人、土夷、島夷、近國、遠邦、邊塞。編下設目，如《歷代篇》設“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唐、虞、舜、夏、商……”它從民本思想出發，重視民眾和民心，認為既強且大的元朝，不到百年而滅亡，其原因在於統治者“不顧民怨”、“不顧民變”。提倡融貫文武，認為將應通儒，亦或可為將，或在戰爭中承當各種重要使命，提出“漢高溺儒冠，全忠置濁流，亦大誤矣”的觀點。它強調“能得士者強，能用士者勝”，並提出對士要善求、恭禮、尊事、納其謀、任之專等。主張以法治軍，認為“從來名將未有不法之峻者”，又強調寬容待下，“必寬容得宜”。作戰中主張臨時制變，因機制勝，靈活用兵，反對“長城易潰，頃刻而入，無益疆圉”的觀點，指出如無長城，“則塞下田不可得而耕”，“塞下人不可得而居”，提出“外憑長城以為藩，內列堡塞以為固”的

防禦戰略。這些均反映了輯錄者重視民眾和士兵在戰爭中的作用，主張根據敵我雙方情況靈活用兵、攻虛擊弱等軍事思想。該書廣集自遠古以至明代中國境內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風土人情、軍事地理、軍事制度、戰爭、軍隊、兵器以及用兵作戰的史料故事，旨在總結歷代用兵得失、統兵作戰的經驗，從中可窺見其軍事思想。它的資料豐富，評論不乏精語，為後人研究古代軍事思想提供了方便。1915年該書始由南昌《豫章叢書》編刻局刊印（參看1997年4月北方方正電子出版社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兵跡》第486—489頁）

### 第9冊 《兵謀》、《兵法》、《乾坤大略》及《補遺》

1、《兵謀》、《兵法》，各1卷，它們是輯錄《左傳》用兵謀略和用兵之法的兵書，明末清初魏禧編輯。《左傳》是一部記載春秋時期歷史的書，起於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終於魯悼公四年（前464），為中國儒家經典之一。春秋時期，諸侯爭霸不已，戰爭頻繁，各國君臣之間相互伐謀鬥智，《左傳》真實地記載了春秋這一段歷史。雖然它是一部史書，卻充滿了春秋君臣的用兵謀略和用兵之法。為了區別用兵之法和用兵之謀，魏禧在首頁就開宗明義地說：“凡兵有可見，有不可見。可見曰法，不可見曰謀。”他把《左傳》中的有關“謀”和“法”的史實進行剖析論述，綜合歸納，分別取名《兵謀》和《兵法》。

《兵謀》概括出《左傳》中的32種用兵謀略：“曰和、曰悉、曰忍、曰弱、曰疆、曰致、曰畏、曰防……”它舉例說，“和，上下禮讓，同心是也”；“量，度量敵我”；“備，戒備，未戰備戰，未敗備敗，有備無患”；“詭，詭詐，知人之詭，我以詭人”等等。作者在每種謀略之後輯錄《左傳》中有關戰例若干條，每條戰例後都一一注明《左傳》中的年代，以便於查找。如“弱”條下輯錄了“文公退三舍以驕子玉”等10餘條戰例，均注明年代。作者不僅輯錄戰例，還時時申述自己的看法。如“聽”（傾聽部眾賢能的意見）條下指出：“或聽於眾，或聽於賢，或聽於能，或聽於尊；不聽則敗，聽於私則敗”，意即要聽取眾人、賢人、能人、長者的意見，才能取勝；拒絕別人的意見而一意孤行，或偏聽一人之言則必致失敗。

《兵法》的體例與《兵謀》一樣，它將《左傳》中的用兵之法歸納為22種：“曰先、曰潛、曰覆、曰誘、曰乘、曰衷、曰誤、曰震……”接著舉例：“先”，先聲奪人，先發制敵”；“分，兵必分道，以攻則奇、以守則固，以罷（即“疲”）人則逸、以息民則不勞，以備不虞則不敗”；“乘”，乘敵不意，攻敵不備。如乘敵於未陣，乘敵於半濟等。每法之後，作者輯錄了《左傳》中的有關戰例，並注明在《左傳》中的年代。在《兵法跋》中，魏氏又指出兵謀和兵法的不同：兵法，“亦謀之屬也。”“謀在兵之先，兵之後慮遠而不可猝見者命之謀，謀在臨事者命之法”等等。

《兵謀》和《兵法》既是魏禧讀《左傳》的劄記，又是他論用兵之謀、用兵之法的武略著作，後人評論“《兵謀》、《兵法》二篇，與韓非內外儲同格”，魏氏“以文法言兵，以兵法作文”。二者引用戰例十分豐富，對研究《左傳》的謀略思想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兵經百字》第281—283頁）

2、《乾坤大略》。10卷，附補遺1卷，明末清初王餘佑撰。王餘佑(1615——1684)，字申之，一字介祺，號五公山人，直隸新城人。早年從孫奇逢學兵法，並隨其征戰，與茅元儀、杜越、刁包等人為師友。其治學則以性理為根本，注重兵法及技擊，具有鮮明的反清復明意識，為北方實學派之先驅者。明亡後，隱居山野，熟覽天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因而著《乾坤大略》，並有《八陣圖》、《兵民經略圖》等兵書傳世。

《乾坤大略》是一部輯評歷代用兵得失的軍事著作。正如作者在該書的後記中說：此書不是討論如何治兵、練兵這些具體問題的，而是討論足以扭轉乾坤的用兵方略——“乾坤大略”的。卷一是談兵起要先知所向；卷二是談兵進必有奇道；卷三是介紹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為上；卷四論及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卷五論述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卷六指出攻取必於要害；卷七強調據守必審形勝；卷八論述立國在有規模；卷九強調兵聚必資屯田；卷十指出克敵在勿欲速；補遺：佐勝之著，編中未錄者，偶記於此。“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各卷之間互相聯貫，自成體系。其體例與他書有所不同，全書之前有“總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它按類彙集歷代戰爭戰例，每卷圍繞某一主題展開論述。如卷一說：兵起之初就要審敵強弱，選擇正確的進攻方向，確定正確的戰略部署，而一旦選定方向，就要疾速而取。又如卷二著重論“初戰”問題。作者認為，必須重視“初戰”，應竭盡全力爭取初戰的勝利，因為初戰告捷，便能滅敵銳氣而長我威風，使敵眾喪膽而已軍志定威立。作者在其他卷中認為作戰時要出奇設伏；進攻時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掃清進退障礙，如要害之地為敵所據，將如魚鯁在喉；防守時，要固守住對戰爭勝負有決定意義的形勝之地。最後，作者論述了用兵全勝的謀略。主張在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待機而動，不可死打硬拼，魯莽從事。《乾坤大略》版本，有《畿輔叢書》本、寶興堂光緒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才館1920年鉛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鉛印本。收入本書的為《畿輔叢書》本（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乾坤大略》第276—281頁）

## 第10冊《草廬經略》

《草廬經略》，12卷（乾隆抄本作8卷，道光抄本作6卷），共152篇，作者不詳。據書中所記內容推斷，該書成于明萬曆初年。它是中國明代分類論述治軍和作戰等問題的兵書。

《草廬經略》是明代後期一部較有成就的兵書。每篇體例類同《百戰奇法》、《白毫子兵壘》等，正文論述理論，附史事以為例證，間有理論的進一步闡釋。內容廣泛，涉及練武援陣、選材用賢、行賞用罰、將帥修養、設計定謀、車騎步兵的應用及各種戰法等。在戰爭觀方面，它主張興“仁義”之師，“禁暴安民”。認為戰爭的目的不是“以殺為務”，“要在平走安歇”。在訓練方面，它站在戰略的高度，將“操練”列於全書之首，認為“善操之將即善戰之將。”

（卷一）對於訓練內容，認為並非只練步伍陣法，還必須練藝，練耳目，練心，練膽氣。對於教藝，要求教能臨陣殺敵的“正法”，反對教只能看不能戰的“花法”。在將帥選拔方面，主張任人為賢，知人善任：“不患世無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用，知而不善用之與無人。”（卷一）對於將帥的條件，它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了較詳細的闡發，提出將帥必須具有謀、勇、勤勉、信用、廉潔、律己、敢於獻身、善於用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能力等等。對於將帥與士卒的關係，提出“兵將相習”（卷一），在賞罰方面，主張“小犯則宥，大犯則誅；無心之犯則看，有心之犯則誅。”（卷一）強調“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在陣法運用方面，既主張學古法，又反對泥古法。在人事與陰陽的關係方面，正確闡述了陰陽、占卜等東西均是由人創造出來的。所以，主張先修人事，禁祥去疑：“太乙可知，而不可恃。”

《草廬經略》廣采前人舊說，間有作者的創見，比較全面地介紹了中國古代兵學的基本理論，它文字簡約，論述翔實，特別是從不同側面對戰略、戰術等方面進行分析比較，為後世所重視。清人宋慶稱：此書“逐條論斷，最為審密。”“近時《武備志》、《讀史兵略》諸書雖該博過此，而精當遜之，亦談兵者不可缺少之書。”民國年間有人甚至稱其為“中國兵學通論”（參看1997年4月北方方正電子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草廬經略》第201—207頁）

## 第11冊：《泝澚百金方》

《泝澚百金方》，14卷，約14萬字，舊題惠麓酒民編，一說清袁（吳）宮桂編，皆不可考。“泝澚”取自《莊子·逍遙遊》：“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澚恍為事”，意以防手龜裂喻國家防禦之策。該書約成于乾隆元年（1736），現存乾隆五十三年（1789）刻本，道光時重刻，更名《備豫錄》，咸豐、光緒時重印。

《泝澚百金方》是清代匯輯評論歷代戰略防禦的兵書。據道光《陳介平〈泝澚百金方〉序》稱，該書“實本于《金湯十二籌》”，共收錄各種兵器、攻防器械、火炮戰船等圖175幅。它吸收了其他城守書的內容，事例多取材于《左傳》、《周禮》、“二十一史”中關於戰略防禦的內容。所論戰略防禦的核心是防患於未然，以民為本。該書認為，即使太平之世，也應做到“安不忘危、盛必慮衰”、“有備無患”（《泝澚百金方》乾隆刊本），備戰禦敵應以“固結民心”為制勝

根本之策。關於備戰的內容和措施，主要從四方面進行論述：一是在人力準備上，主張練兵和兵民結合。練兵要以“訓兵六章”（忠愛、敢戰、守法、勤習、敦睦、信義）為準則，以練心、練藝、練膽為主；主張建立鄉兵，組織鄉民，實行兵民聯合防禦。二是在物力準備上，重糧儲和兵器製造。認為“積貯為天下之大命”。金城湯池，帶甲百萬，無粟不可守，強調“公督私藏”、“藏富於民”；對各種兵器構造使用、火藥配製方法詳加記載。並指出，如果器械不利，勢必要“以卒與敵”。三是在戰守上，提出“善守如環”、“以戰為守”的原則，主張“天降”（下雲梯出擊）、“地出”（從地道出擊）“近沖”、“遠擊”及正兵、奇兵等互相配合運用。四是主張正確地利用地形，認為“扼險者勝，恃險者亡。”等。

《洪濬百金方》編制體例完備、系統，有一定的邏輯性。圖文並茂，內容豐富，至今仍是研究古代軍事的重要參考資料（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洪濬百金方》第337—342頁）。

## 第12冊：《百將圖傳》、《古今女將傳贊》

1、《百將圖傳》，2卷，丁日昌選編。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又字禹生，廣東豐順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洋務派政治家，以洋務能員著稱，也是清代較早接觸資本主義文化的人物之一。

《百將圖傳》是我國近代一部大型的歷代名將圖、傳合集。它敘寫從西周太公呂尚起至明末女將秦良玉止的100個傑出將帥的故事，部分資料是在《廣名將譜》的基礎上不斷擴充起來的，其中不見於《廣名將譜》的就有29人之多。丁日昌是晚清四大藏書家之一，他收錄的軍事人物資料豐富，來源廣泛。在《百將圖傳》當中，有些是在明清兩代民間小說、戲曲的演唱中很著名的將領，如《三國演義》中的趙雲、許褚，《睢陽忠毅錄》中的南霽雲，《楊家將演義》中的楊延昭等；有些是出身貧賤、崛起于士卒的將領，如漢代的樊噲、三國的典韋、隋代的沈光以及唐代的石雄、崔寧，元代的史弼等；有些是原有劣跡，後來斷然改邪歸正、大有作為的將領，如三國的甘甯、晉代的周處等。此外還選了幾位歷史上有名的女將，如《齊鑣射獵》中的北魏潘氏、《對開幕府》中的唐代平陽公主、《桴鼓助戰》中的宋代梁夫人、《平臺賜彩》中的明代秦良玉等，這是在其他名將傳記中很少提及的。

本書在傳記內容的側重和體例的安排上，頗有特色。它對每個人物的生平履歷只作簡要介紹，著重敘寫他們戰鬥生涯中一兩件戰例，以突出書中主人智勇雙全、戰功卓絕的高尚品德。題目採用通俗文學常用的四字標示，如孫臏“馬陵伏弩”、田單“火牛破敵”、馬援“聚米為山”、尉遲恭“殿前奪稍”、薛仁貴“天山三箭”、狄青“微服度關”、李文忠“麾退女樂”、戚繼光“陣演鴛鴦”

等等，書內配以著名畫師陸昀和刻工陳振海的精湛插圖，使得該書趣味性、可讀性較強。

《百將圖傳》反映了丁日昌整頓舊軍、選拔人才、改進作戰方法和軍事器械裝備的治軍思想，對於研究古代軍事人物和戰例，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在今天特別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它對於鼓勵青年人發奮向上、忠勇報國，對於我們為人處世、經營謀劃，仍有很強的教育意義。原書為江蘇書局刻于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

2、《古今女將傳贊》，2卷，清朱孔彰編述。朱孔彰（1842—1919）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原名孔陽，字仲我，又字仲武，晚自署聖和老人，清末舉人。以治經受知于曾國藩，延為幕客。後襄校江南官書房。為劉坤一、馮熙聘修《兩淮鹽法志》、《鳳陽志》，兼主淮南書局、江楚編譯局，協修《江南通志》。曾長掌蒙城書院，繼掌教安徽存古學堂。辛亥革命後，應清史館聘，成傳稿數十篇。朱孔彰善書，著述甚富，有《春秋梁傳漢注》、《三朝聞見錄》、《中興將帥別傳》等。

據本書作者的兒子朱師轍在後跋稱，當時西方女學大興，“中國舊習，女子和柔婉順為美，而鮮剛疆毅烈之風，不足以應世變，維危局，乃取正史及百家集記女子好義知兵、禦侮衛國有奇節者，上自軒轅、下逮清代，都為一篇。”遂輯集古代女輩而有武略者而成此書，以圖振奮我國女性。《古今女將傳贊》全書共收錄我國歷史上的女性69人。其中上卷26人，下卷43人。有手書戰經的元女，有錦傘膺榮的冼夫人，有代父戍邊的木蘭女，有堅守家堡的秦良玉……等等。每傳一人，前錄其事蹟，後加讚語，語言簡練，很有特色。它是一部關於中國歷代女傑的傳記之書，對後代有教育意義。

### 第13冊：《孔孟治兵語錄》、《岳飛治兵語錄》、《戚繼光治兵語錄》、《曾胡治兵語錄》

1、《孔孟治兵語錄》，孔子、孟子著，趙尺子選輯。孔孟，即孔子和孟子的合稱。據本書編者趙尺子自序，趙尺子自“三十八年五月起，至四十二年九月止”（1949—1953年）在臺灣鳳山四訓練班、軍校和步校的進行政治教育時，“先後對十萬員生戰士講授軍人人生哲學並主張軍人魂運動，希望養成若干位儒將。”此書就是在此基礎之上編成的。據此可知，他的政治傾向則自不用言：即是為蔣介石“反攻大陸、抗俄復國”政治服務的。全書共分10章，其中《孔子治兵語錄》4章，《孟子治兵語錄》6章，相同內容有國策、士德、統禦，《孔子治兵語錄》最後二章是訓練和作戰；《孟子治兵語錄》是談總動員、心理作戰和戰史。本冊的結構，按照原文、要領、注釋的次序來安排。

孔子的兵學精神，趙尺子概括為“智、仁、勇”（《中庸》），“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孔子的戰略思想，包括幾個方面：首先是仁道：“道得眾則得國，道失眾則失國。”（《中庸》）；其次是“因國說”：“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穀梁傳·莊公三十年》），對於孔子的攻守戰略，趙尺子說：“孔子的攻勢戰略，為扶植‘因國’；守勢戰略，即防止他國到我國來建立‘因國’”，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孔子的武學精神，趙尺子在《武德》等章中加以引錄；孔子的治兵思想、戰略戰術思想，在《統馭》、《訓練》、《作戰》等章中也得以反映。孔子重視武備，慎於兵事。他以“六藝”（禮、樂、射、禦、書、數）教人，其中射、禦即為兵學：“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孟子治兵語錄》繼承了孔子的兵學思想，在某些方面加以發展。如師克在和，多難興邦。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醜篇》下）；“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告子篇》下）又如抵禦外侮。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離婁篇》上）關於孔孟兵學思想，另據臺灣魏汝霖教授的概括，有 11 方面的內容：如王道政治，足食、足兵；崇管仲而夢周公；有夫子之勇、浩然之氣；仁者無敵；弔民伐罪等等。

趙尺子認為，周朝是文武合一的時代，孔子是允文允武的至聖。他的兵學思想，“為孫子十三篇的先路”，是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後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岳飛治兵語錄》，岳飛著，劉詠堯輯。岳飛(1103-1142)，字鵬舉，相州湯陰（河南湯陰）人，南宋著名的軍事家，抗金名將，民族英雄。劉詠堯（1908—1998），字則之、號武琨，湖南醴陵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參加了東征、北伐和抗日戰爭。歷任國民革命軍營長、團長、陸軍 50 師政治部主任、中央軍校政訓處長、政治總教官、湖南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廳長、軍委會廬山軍訓團講師、陸軍大學教授、“國防部”次長、代部長。1949 年去臺灣，1951 年被授為陸軍二級上將，後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

《岳飛治兵語錄》是關於岳飛治軍言論的軍事著作。據其自序稱：“余既景仰武穆之武功和節操，猶喜頌其詩文。因就平日所讀詩作和史書記載，檢其治軍要言與夫立身處事之妙語，輯為《岳飛治兵語錄》。”全文共分 7 章，分別為精忠報國、戰略思想、戰術運用、戰鬥活動、整軍安民、忠義感召、謙讓愛人。從文中內容看，岳飛治兵言論，采輯于岳飛的詩詞、碑文、奏章及其專記、故事等處。其治軍思想，根據劉詠堯的概括有 6 方面。“縱觀岳武穆治軍之道，其大要有六”：一曰重搜選，貴精不貴多。如“以八百人破賊王善曹成等五十萬。”（《戰鬥活動》）；二曰謹訓習，止兵秀舍，輒課以藝，視無事時為有事時；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四曰明號令，要言不繁，令出必行。如戰金人於候兆川時說：“吾已兩捷，彼必並力來，吾屬雖寡，當為必勝計，不用命者斬。”（《戰鬥活動》）；五曰嚴紀律，約束師眾，秋毫不犯（《整軍安

民》)；六曰同甘共苦，禦下以誠。書中7章，均圍繞著這6方面展開。岳飛是我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其率領的軍隊被稱為“岳家軍”，金人曾流傳著“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名句，可見他在金軍的影響。《岳飛治兵語錄》是對岳飛一生軍事思想的概括和總結，是研究岳飛生平和軍事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

3、《戚繼光治兵語錄》，戚繼光著，劉詠堯輯。戚繼光(1528—1588)字元敬，山東登州人，明代著名抗倭將領、軍事家。《戚繼光治兵語錄》共35章。章目雖多，但節錄簡要，大部分是劉詠堯從戚繼光的《練兵實紀》、《紀效新書》等著作中節選出來的。是戚繼光治兵言論結集，涉及兵員選拔、部伍編制、旗幟金鼓、武器裝備、將帥修養、軍禮軍法、車步騎兵、水兵的編成保結及建軍、訓練和作戰等內容。概括如下：一是在選兵方面，重精選。在《原選兵》章裏，強調選兵“其法惟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遊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有鄉野老實之人。”選兵的標準是注重士兵成分；二是嚴編伍，使部隊能夠統一行動，有戰鬥力。在選好兵後重在訓練，部隊必須嚴格訓練才能成為節制之師。訓練要嚴，要求士兵熟記各種號令，一絲不苟地執行；從實戰出發，注重實效，提倡練“臨陣的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反對練“花法”、“虛套”；嚴賞罰。嚴格執行各種紀律，如有違犯，依法懲處。三是在練將方面，“練兵之要在練將”，要求將領具備的素質是德、才、識、藝四個方面；培養將領的途徑是研讀兵書，在“實境”中鍛煉。在《正心術》、《作好人》、《堅操守》等章中，對將領的胸襟、節操提出了要求。四是在改善武器裝備方面，指出“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要求重視火器的研製和使用，認為“五兵之中，惟火最烈”等等。劉詠堯在輯錄過程中，比較注重戚繼光關於將士需要掌握的軍事基本技巧和基本素質的培養方面的內容。

戚繼光治兵言論歷來都受到人們的重視。他的軍事思想已成為中國軍事領域的主導思想。抗戰時期，八路軍軍政雜誌社曾將該書第9卷《練將》和另一些關於練將的論述，輯錄成《戚繼光治兵語錄》一書，在延安出版發行。可見戚繼光治兵言論均受到國共兩黨的重視。

4、《曾胡治兵語錄》，是關於曾國藩、胡林翼治軍用兵言論的一部語錄體軍事著作，蔡鏜編輯。蔡鏜(1882—1916)，原名良寅，字松坡，湖南邵陽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傑出的軍事家。曾國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曾任內閣學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職，為清末湘軍首領，洋務派的代表人物，軍事家。也是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擄軍起義的重要人物。胡林翼(1812—1861)，字貺生，號潤芝，湖南益陽人。道光進士，翰林院庶起士，授編修，充江南副考官，捐升知府。擢貴東道員，是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重要人物之一，為清末著名的軍事家，與曾國藩同稱“曾胡”。

《曾胡治兵語錄》共12章，1.4萬餘字，分將材、用人、尚志、誠實、勇毅、嚴明、公正、仁愛、勤勞、和輯、兵機、戰守、治心，前10章圍繞置將、整軍、訓練等，論述治軍中的種種問題。如主張選將要慎重，為將要智勇兼備，練兵要嚴



格。“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用兵方面的“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不可挫”；“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戰陣之事，恃強者是敗機，敬戒者是勝機”；“用兵之道，全軍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敵為上策，得城池次之”；“軍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這些兵學思想，對於中國傳統兵學地位的提升和推動，有積極意義。後3章則專門論述戰略、戰術中的重要問題。主張“簡練慎出”，無充分準備不輕言戰。以後發制人為主，又注意搶佔先要以求先制，重視以主待客、持久待變，提出“以靜制動，以逸待勞”，戰法重奇正，防守強調掌握重點，進攻重機宜，行止重謹慎。每章後加評語，或是對本章內容的概括歸納，或是對曾胡言論的評述，或是借題發揮，以闡發其軍事思想。如“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蔡鏗認為帶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可付之一炬”；又如“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蔡鏗認為這是“扼要探本之論”，並將其忠君衛道的內容轉換為救國救民的大義，為這個命題賦予了新的內涵。蔡鏗還從曾胡“以主待客”的作戰指導思想受到啟發，對西方軍事思想中的“極端進攻”作了批判分析，提出中國在反侵略戰爭中應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反映了蔡鏗軍事思想的過人之處。

《曾胡治兵語錄》於1917年由上海振武書局刊行，1924年蔣介石把它作為黃埔軍校教材，並增輯《治心》一章出版。1943年八路軍《軍政雜誌》曾出版《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白話句解》，1945年八路軍山東軍區重印出版。可見曾胡軍事思想均受到國共兩黨的重視，對中國軍事學術有一定的影響（參看1989年《辭海》縮印本第341頁、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曾胡治兵語錄》第254—260頁）

#### 第14冊：《國父治兵語錄》、《蔣總統治兵語錄》

1、《國父治兵語錄》，孫中山著，劉詠堯編輯。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號逸仙，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中國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國父治兵語錄》是關於孫中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的軍事問題的言論輯錄，摘錄於孫中山各時期的電文、演講、著作中，全書共5章。根據劉詠堯的概括，《國父治兵語錄》有7方面的特點：一是加強政治戰。“國父對革命戰爭，咸以政治戰為主，而以軍事戰為輔。”如第一章關於戰爭的條件——外交手段，就是政治戰之一。二是宣導總體戰。如強調：“國防戰爭，並不是單一的純軍事和武力的戰爭，而是含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軍事的諸種戰爭。”三是厲行精兵主義，“國父認為軍隊貴精而不貴多，對裁汰冗兵及實行兵工政策等主張之用意，皆在求其達到精兵之目的。”四是重視軍隊編制（建制），這主要體現在第三章《軍政》中，如關於軍隊組織、編制、兵役制度、後勤管理等；五是注重軍

人精神教育，如第二章第四節所述“軍人之精神”說：“故在今日欲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即為現在軍人之精神。但所謂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為革命軍人精神之要素。即發揚此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六是強調戰略和戰術之配合。在第四、第五章中，對辛亥革命、護法鬥爭、戡亂、北伐戰爭的戰略和戰術進行概括，七是讚揚遊勇戰術。在第四、第五章中亦有所論及。

《國父治兵語錄》用語簡略，是研究孫中山軍事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

2、《蔣總統治兵語錄》，蔣介石著，鄧文儀編輯。蔣介石（1887.10—1975.4），名中正，字介石。近代中國軍事家及政治家，浙江奉化溪口人。祖籍江蘇宜興，中華民國前總統。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繼為中國國民黨領導人。他揮軍北伐，抗擊當時佔據北方的軍閥並獲得勝利；1928年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大陸，成為中華民國全國領導人。領導中國抗日期間，蔣介石在國內、國際的聲望顯著提升，成為同盟國領袖四巨頭之一。蔣氏試圖剿滅中國共產黨，但最終在國共兩黨內戰中失敗，被迫撤退至臺灣。歷任臺灣領導人及國民黨總裁，1975年病逝於臺灣（參看《培訓通》資料中心《蔣介石簡介》）。鄧文儀（1906—1998），字雪冰，湖南醴陵縣浦口鎮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1928年至1934年任蔣介石侍從秘書。1935年任駐蘇大使館首席武官，後歷任成都行轅政治部主任、第3戰區政治部主任、軍政部第1廳廳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政工局局長等，1949年赴臺灣，任臺灣國民黨中央常委，臺灣中國文化學院教授等職務。

《蔣總統治兵語錄》原名《蔣主席治兵語錄》，1947年7月由南京新中國出版社出版。是鄧文儀從蔣介石在各個時期的講話、文電選取出來的軍事言論集，收入《中國兵學大系》時有增訂。分兩部分：《蔣總統治兵語錄》和《蔣總統治兵語錄續編》，包括11篇，即國防、戰理、將材、武德、治心、研究、軍紀、愛民、練兵、帶兵、用兵（《續編》只有10篇，減“愛民”1篇）。《蔣總統治兵語錄》比較全面地輯錄蔣介石的軍事言論。其主要內容有：一是關於國防建設的。主要體現在《國防》、《戰理》等篇。蔣介石認為，國防建設是國家的生存之本。無國防，即無國家：“我們中國的國防一天建立不起來，我們國家一天不能安全，我們民族亦一天不能保存。”（第1篇《國防：從速建立國防》）國防建設內容廣泛，包括軍事國防，經濟（工業）國防、精神（思想）國防等；國防建設的措施，不同時期有不同要求。抗日戰爭爆發後，明確提出並制定守勢國防方針，加強戰略後方建設。強調政略高於戰略，戰略服從政略，以政略為依歸，並以政略目的貫徹於戰爭全過程。在3年內戰及退守臺灣時期，以“剿匪”（剿共）與“反攻”大陸為內容。如“實行憲政，必須剷除共匪武裝集團”、“剿匪戰爭的意義”等（見《第一篇：國防》），反映了蔣介石反共、發動內戰的思想。二是關於軍隊建設的，主要體現在《將材篇》、《武德篇》、《治心篇》、《軍紀》等篇中。蔣介石認為，建國必先建軍，建軍必須選好將，首先要重視軍官的培養：“建國必須建軍，建軍必須建立軍官，而要建立軍官，就要先建立軍官的精神”（《將材篇》），提出軍官特別是高級將領一定要進軍事院校深造，接受現

代軍事思想和科學知識。其次要制定一套好的制度，《軍紀篇》節錄了 20 條。如“軍紀、軍法就是我們戰時轉敗為勝、轉危為安的唯一關鍵。”再次要選好兵、練好兵、用好兵，提出士兵教育幹部化，幹部教育超級化，反映了蔣介石的治軍思想。三是關於戰略、戰術的。主要體現在《戰理》、《將材》、《武德》、《軍紀》、《練兵》、《帶兵》、《用兵》等篇中。《用兵》對各種戰略、戰術的原理、原則論述頗詳，這些戰略、戰術，在對付軍閥和抗日作戰方面，發揮了較重要的作用。在與共產黨作戰方面，卻提出“剿匪戰術的六大原則”、“剿匪軍事的三種戰術”（續篇《用兵》）等許多原則和戰術，造成戰略、戰術的失誤，最後喪失統治大陸的政權。

《蔣總統治兵語錄》是對蔣介石不同時期統率軍隊和指揮作戰的言論和實踐總結，其中蔣介石的治軍言論是本書的重要內容，它對國民黨軍隊的建設和作戰具有指導意義。同時也是蔣介石反共的戰鬥綱領和自白書，至今仍是研究蔣介石軍事思想和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的重要資料。

“《中國兵學大系》各冊概要”參考書目：

- 1、李浴日《中國兵學大系》，1957年1月臺灣世界兵學社出版；
- 2、《辭海》縮印本，198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 3、《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北方方正電子出版社，1997年4月版；
- 4、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1990年10月解放軍出版社
- 5、王兆春《中國歷代兵書》，2010年8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 6、《中國歷代兵書集成》，解放軍出版社與遼沈書社聯合出版。

2011年1月完稿

### 作者介紹

李龍，1966年10月出生於雷州半島一個普通農家。大學本科畢業。長期以來，致力於區域文化的研究、創作和收藏，為雷州文化研究的民間主要學者之一。現為湛江師範學院雷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湛江海洋大學雷州文化基地研究員，雷州市第七、第八屆政協委員。電子郵箱：leizhoulilong@163.com